

# 論臺灣紀年款宣德爐的年代、成分與文化意涵

李建緯

逢甲大學文化與社會創新碩士學位學程特聘教授

## 摘要

大陸閩、粵先民大量遷徙至臺灣，亦帶來並遺留了不少傳世的宣德爐。傳統上，宣德爐的斷代主要依據器物造形與款識，尤以器底的款識書寫方式為核心判斷依據。就臺灣現存傳世銅爐而言，其器底款識大致可分為三類：帝王款式、私人鑄坊堂號，以及個人落款。雖然款識多樣，但坊間仍普遍以「大明宣德年製」或「宣德年製」的楷書或篆書款，作為斷代依據。

實際田野調查發現，臺灣寺廟所藏的傳世宣德爐，多由信徒捐獻。這些器物除爐底的規範化款識外，器表往往另刻敬獻者姓名及具體的捐獻年代。這類鑿刻的紀年款，提供了明確且可驗證的絕對年代，公信力遠高於僅依爐底款識的推斷。因此，這些紀年款不僅有助於精確界定來自大陸的宣德爐在臺灣流行的時期，更能揭示並修正部分寺廟刻意營造之「建廟歷史悠久」的神話，為臺灣宗教器物研究提供重要的史料依據。

關鍵字：宣德爐、款識、鑿刻紀年、金屬成份、神話

## 壹、宣德爐誕生的背景與疑問

### 一、宣德爐背景與其神話

宣德銅爐又稱「宣德爐」、「宣德鑪」、「宣爐」、「煊爐」。有關記載宣德爐的文獻，見署名明呂棠所撰《宣德彝器譜》（又稱《三卷譜》，呂棠實為呂震之誤）、呂震（1365-1426）撰《宣德鼎彝譜》（又稱《八卷譜》）與《宣德彝器圖譜》（又稱《廿卷譜》）。<sup>1</sup> 上述三種版本提到，明宣德3年（1428）宣德皇帝命令呂震以暹羅國王刺迦靄進貢風磨銅（紅銅）數萬斤（約23噸）開爐，並和金銀銅鉛等數十種貴金屬一同鑄造，製作爐鼎彝器。按《宣德鼎彝譜》卷一記錄，當時共鑄3,365件（圖1）；<sup>2</sup> 又《宣德彝器圖譜》卷20提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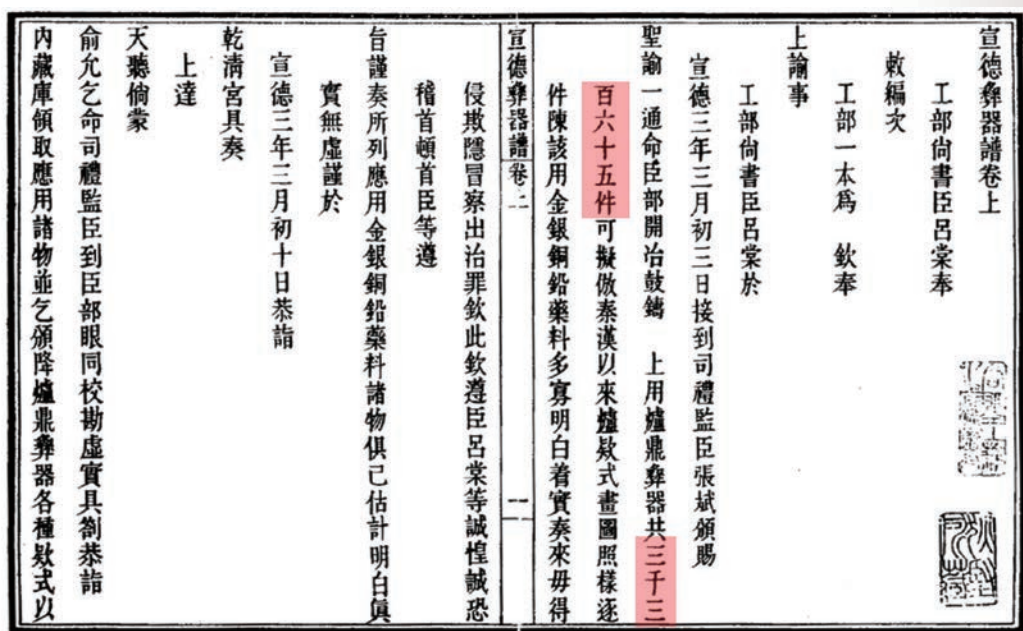


圖1 呂棠（筆者按：呂震之誤），《宣德彝器譜》卷上  
資料來源：呂棠編、清杭世駿撰，《宣德彝器譜》，頁479。

1 劉靜敏，〈宣德彝器圖譜之探討〉，《歷史文物》，第6卷第2期（1996年4月），頁44。

2 呂棠編、杭世駿撰，《宣德彝器譜》，收入《叢書集成續編》，第94冊（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88年），頁479。

同年 11 月補鑄一萬五千餘件，合計約一萬八千件左右。<sup>3</sup> 這批彝器以爐最多，特點是外觀金屬皮色千變萬化，在黝黑外表中隱透出閃亮光芒，爐底常作「大明宣德年製」，故世稱「宣德爐」（圖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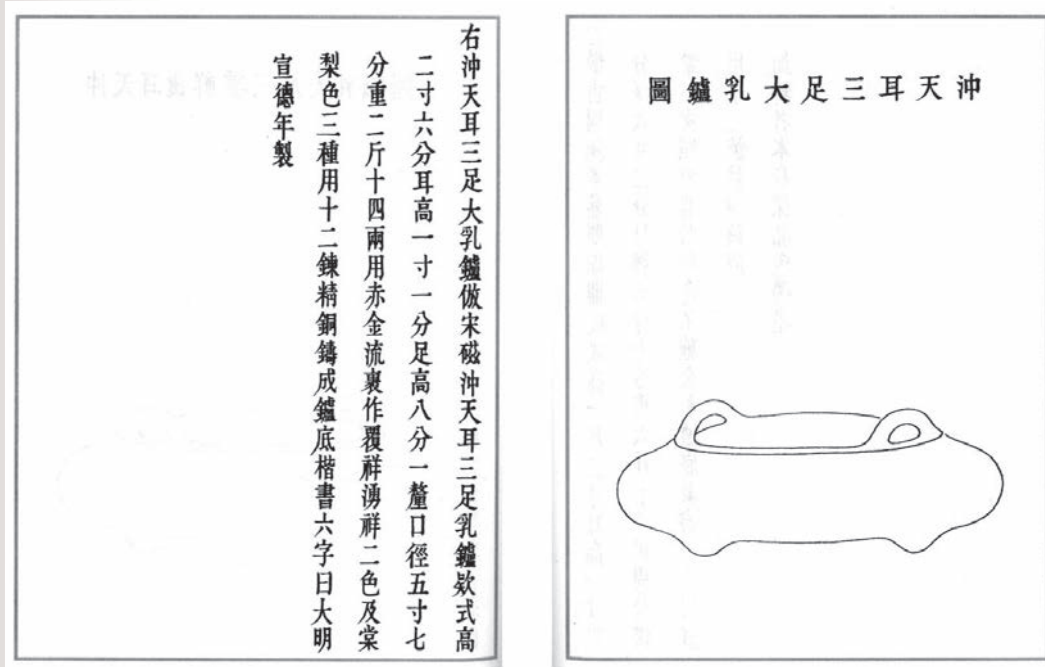


圖 2 呂震，《宣德彝器圖譜》卷六〈冲天耳三足大乳鑪圖〉

資料來源：呂震，《宣德彝器圖譜》（北京：中國書店，2006 年），頁 74-75。

宣德爐在明晚期已為文玩珍品追逐對象，明嘉靖 5 年（1526）祝允明已喟嘆宣德爐：「鼎彝雖小，所費甚鉅，幾於金玉同價。金玉恆有而宣銅彝傳世頗稀。民間單冶薄鑄何能辦此。倘有得者，當與商彝周鼎共寶。」；而明末〈改過齋雜記〉（圖 3）也有以下說法：「宣德年鑄薰爐，海內所珍，今多贗物，真者百之一耳，市者一爐索數十金，卒難得其佳者。慈壽寺西有元福宮，文昌祠前鑄一驢（作者按：應為爐），傳是宣德年所造。遊人以手摩挲，

3 呂震，《宣德鼎彝譜》（北京：中國書店，2006 年），頁 262-276。

銅質呈露，其色甚瑩。驗驢（爐）之質，亦可辨薰爐之真贗矣。」<sup>4</sup>又明代高濂所著，刊行於萬曆 19 年（1591）的《遵生八箋》（圖 3）更有以下說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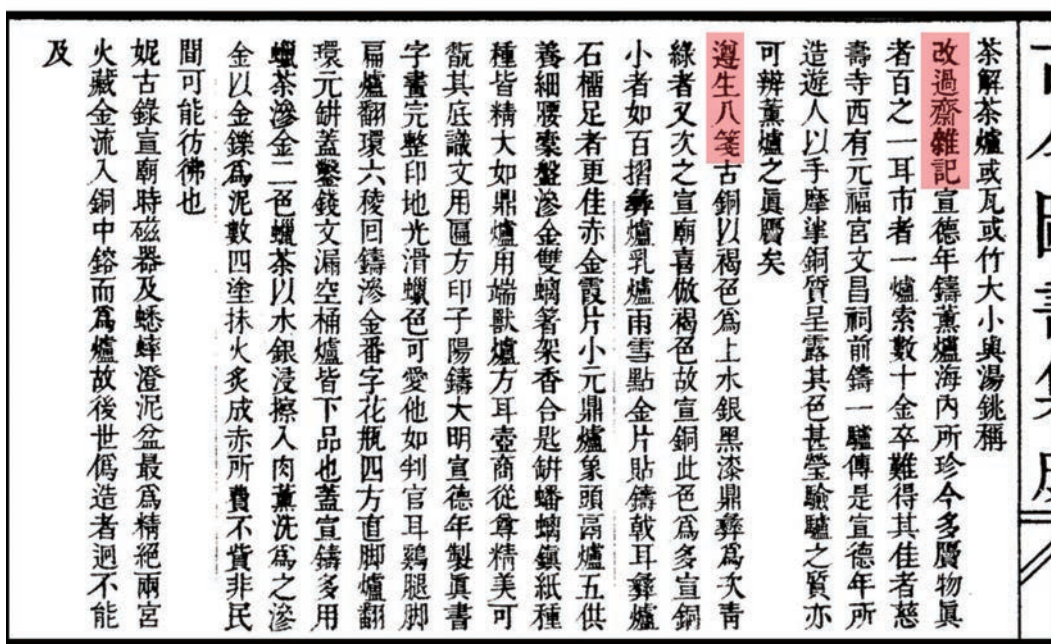


圖 3 《古今圖書集成》記載明末〈改過齋雜記〉、《遵生八箋》中關於宣德爐鑑定與品鑑之法。

資料來源：〈經濟彙編考工典第 236 卷爐部〉，《古今圖書集成》，第 799 冊，頁 30。

古銅以褐色為上…宣廟喜做褐色，故宣銅此色為多。宣銅小者，如百摺彝爐、乳爐，雨雪點金片，貼鑄戟耳彝爐，石榴足者更佳，赤金霞片。小元鼎爐，象頭鬲爐，五供養，細腰橐盤、滲金雙螭箸架、香合匙餅、蟠螭鎮紙，種種皆精。大如鼎爐，角端獸爐，方耳壺商從尊，精美可翫。其底識文用匾方印子，陽鑄「大明宣德年製」，真書字畫完整，印地光滑，蠟色可愛。他如「判官耳」、雞腿腳、扁爐、翻環六稜、回鑄滲金番字花瓶、四方、直脚爐、

4 〈經濟彙編考工典第 236 卷爐部〉，《古今圖書集成》，收錄於「維基文庫」：[https://zh.wikisource.org/zh-hant/Page:Gujin\\_Tushu\\_Jicheng\\_Volume\\_799\\_\(1700-1725\).djvu/61](https://zh.wikisource.org/zh-hant/Page:Gujin_Tushu_Jicheng_Volume_799_(1700-1725).djvu/61)（2023/11/6 點閱）。

翻環元餅，蓋鑿錢文。漏空桶爐，皆下品也。蓋宣鑄多用蠟茶、滲金二色，蠟茶以水銀浸擦入肉，薰洗為之。滲金以金鑠為泥，數四塗抹，火炙成赤，所費不貲。非民間可能彷彿也。<sup>5</sup>

該文內容提及宣爐銅質、皮色、型態、款識、等級、仿作等現象，可說是開啟了辨識宣德爐知識的早期文獻。

現階段不論收藏界或學界，對宣德爐分類或命名方式，主要係參照爐耳造形，並搭配足部形態而定，如蚰龍耳爐、壓經爐、沖耳爐、橋耳爐、獅首耳爐、朝冠耳爐、戟耳爐、雙魚耳、鬲式爐…等；足則分乳足、圈足、獸足、象足、高足等不一而足。筆者認為，宣德爐各類耳朵造形，從來就不是考量到熏香功能——若只考量耐受焚香容器的功能，統一設計成圓腹無耳的鬲式爐即可——之所以衍生各類不同形態爐耳，係因爐耳差異能對位出不同造形上的意義，從而衍生出不同的分類標籤；此外，爐之皮色、足之形態，皆是創造各種差異性的要素。<sup>6</sup> 這種驅動創造出不同耳式與不同名稱分類標籤的宣德爐背後動力，不能排除來自收藏上的需要。

真正使宣德爐成為現代文物收藏界競逐對象，係 2003 年中國嘉德宣爐拍賣專場，二十世紀大收藏家王世襄舊藏的 21 件宣德爐，被一位匿名買家以人民幣 1,179.2 萬元拍得，創當時宣德爐交易紀錄。<sup>7</sup> 而 2008 年一件被認為明宣德年間製作〈金胎鑿龍三足蓋爐〉，在香港蘇富比春季拍賣會上更以

5 〈經濟彙編考工典第 236 卷爐部〉，《古今圖書集成》，收錄於「維基文庫」：[https://zh.wikisource.org/zh-hant/Page:Gujin\\_Tushu\\_Jicheng\\_Volume\\_799\\_\(1700-1725\).djvu/61](https://zh.wikisource.org/zh-hant/Page:Gujin_Tushu_Jicheng_Volume_799_(1700-1725).djvu/61) (2023/11/6 點閱)。

6 以索緒爾 (Ferdinand de Saussure, 1857-1913) 的符號學來說，他認為意義產生於元素與其關係的交互作用。而意義的產生，一種產生於符號的一體二元性 (sign as two sided entities) 的形成過程，如「樹」與該字所代表的普遍的形象；此外，意義也產生於「差異」(differences) 關係作用中，如各種不同類型的樹種，在不同類中交叉比對出所指出特定形象的樹種。Jonathan Culler (喬納森·卡勒) 著、張景智譯，《索緒爾》(臺北：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2 年)，頁 9-45。

7 未著撰人，〈宣德爐收藏在拍賣價格上屢創新高，價格突破千萬元〉(2018/7/24)，收錄於《香天下》：<https://www.xiang.com/news/542.shtml> (2023/10/10 點閱)。

1.168 億港元拍出；<sup>8</sup>2010 年北京匡時秋拍王世襄舊藏明崇禎年款〈沖天耳金片三足爐〉，拍得價格人民幣 1,512 萬元，創銅爐拍賣紀錄。此後，宣德爐不斷刷新拍賣紀錄，如 2019 年香港「國際古玩展」，Koller 所拍賣的宣德爐更以近 486 萬瑞士法郎成交（港幣 3,850 萬，臺幣 1.52 億）。<sup>9</sup>從當今宣德爐炙手可熱，拍賣屢創紀錄情形來說，基本建立在一個信念，即圍繞「宣德爐」概念下形塑起來的製造、年代、皮色、成分與用途等論述，都無庸置疑。收藏界也深信「宣德爐論述」，與後世收藏衍生出來的「論述」。<sup>10</sup>

## 二、學界對宣德爐的看法

不過，形塑這套論述來源的《宣德鼎彝譜》，著作本身卻存在許多疑點。早在 1936 年法國漢學家伯希和（Paul Pelliot, 1878-1945）已質疑《宣德鼎彝譜》係偽作，作者呂震實逝於宣德元年（1426），不可能有該書所說主導宣德 3 年鑄爐云云；同時，伯希和也發現，此著錄中所述官制、宮殿名稱等，實則有多處謬誤。<sup>11</sup>

20 世紀下半葉以後，關於宣德爐研究，學界也注意到其始鑄的年代問題，並存在兩種分歧角度：一派認為宣德年間確實存在鑄鼎彝之事，此派以

8 未著撰人，〈一件明宣德金胎蓋爐在港拍得 1.168 億港元〉（2008/4/12），收錄於《卓克藝術網》：<http://news.zhuokearts.com/html/20080412/82955.html>（2023/10/10 點閱）。

9 趙志瀚，〈5 分鐘古玩學堂，神龍見首不見尾的都市傳說 - 宣德爐〉（2019/6/11），收錄於《The Value》：<https://hk.thevalue.com/articles/xuande-bronze-censer-koller-auction>（2023/10/10 點閱）。

10 有關「神話」的定義，以馬凌諾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 1884-1942）說法，他指出神話是一種具社會功能的故事：做為過去的故事，神話存在一種功能，即證明現在某些社會秩序應然並維持其原狀。由於神話不斷被曲解或重新解釋，因此得以歷久彌新。而民間記憶中有時會將英雄事蹟混在一起，如佛洛伊德分析夢境時所說的濃縮。Peter Burke（彼得·柏克）著，江政寬譯，〈神話與記憶〉，《歷史學與社會理論》（臺北：麥田出版社，2009 年），頁 120-123。另一方面，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則認為，「神話」來自於符號學系統中的第二秩序，即將原來符號中單純的指涉功能（denotation），轉向「意指作用」（signification），也就是對原指涉的符號，透過扭曲、掩蓋，變形，賦予新的衍生義。本文所用的「神話」，指的是後者觀點。見 Roland Barthes（羅蘭·巴特）著，許薈薈、許綺玲譯，《神話學》（臺北：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7 年），頁 169-187。

11 Paul Pelliot, "Le Prétendu album de Porcelaines de Hiang Yuan-pien," *T'oung Pao*, vol. 32 (1936), pp. 15-58.

張光遠、陳擎光、劉靜敏、李米佳、趙中男等為代表；<sup>12</sup> 另一派則認為《宣德鼎彝譜》等係偽託之作，宣德爐出現年代應是明末清初，此派以 Paul Pelliot、Rose Kerr、陸鵬亮為代表。<sup>13</sup> 關於兩派的討論，可見〈臺灣寺廟現存「宣德爐」形制、年代與功能〉一文的整理。<sup>14</sup> 20 世紀以前宣德爐的研究，因論述和認識還在積累，大致上還是在找尋原始宣德年間第一批「宣德真爐」有哪些，中文學界並未如 Paul Pelliot、Rose Kerr 貿然質疑建構多年宣德年間鑄爐之事的可信度。不過，劉靜敏已注意到，宣德 2 年（1427）及 3 年雖有暹邏入貢記錄，然其物為胡椒、蘇木一類方物，卻未見風磨銅，工部亦未見宣德 3 年鑄造鼎彝之事，應有更多史料深入探討。<sup>15</sup>

21 世紀以後，中文學界也意識到以「呂震」之名的《宣德鼎彝譜》、《宣德彝器圖譜》等著錄疑點。王正華指出，晚明古籍中提到銅器論述，特別強調銅色，尤其是不同原料火候下有不同的銅色發色，不像宋代呂大臨《考古圖》中對於銅器作為歷史重建的功能。<sup>16</sup> 因此宣爐三冊在這樣的背景下，注重銅器發色的論述，反過來影響到晚明如陳洪綬人物畫中的銅器表現手法。該文雖指出《宣德鼎彝譜》、《宣德彝器譜》與《宣德彝器圖譜》三部係偽書，但也提出三冊並非完全憑空捏造，應是其來有自，存在器類上的傳承關係。

12 張光遠，〈大明宣德爐〉，《故宮文物》，第 32 期（1985 年 11 月），頁 4-16；張光遠，〈鎏金精雕大明宣德爐〉（上），《故宮文物》，第 85 期（1990 年 4 月），頁 62-77；張光遠，〈鎏金精雕大明宣德爐〉（下），《故宮文物》，第 85 期（1990 年 5 月），頁 96-107；陳擎光，《故宮歷代香具圖錄》（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94 年），頁 85-89；劉靜敏，〈宣德彝器圖譜之探討〉，頁 44-50；李米佳，《宣德爐研究——故宮藏宣銅器的整理與研究》（北京：科學出版社，2012 年），頁 18-41；趙中男，〈宣德朝宮廷文化的繁榮及其原因〉，《故宮博物院刊》，175 期（2014 年第 5 期），頁 143-157。

13 Rose Kerr, "Sources for the Study of Chinese Bronzes," in *Later Chinese Bronzes* (London: Victoria & Albert Museum, 1990)；陸鵬亮，〈宣爐辨疑〉，《文物》（2008 年 7 月），頁 64-76、92。

14 李建緯，〈臺灣寺廟現存「宣德爐」形制、年代與功能〉，《歷史、記憶與展示：臺灣傳世宗教文物研究》（臺中：豐饒文化社，2018 年），頁 166-171。

15 劉靜敏，〈明清銅爐試析〉，《金玉青煙》（臺北：國立歷史博物館，1996 年），頁 35-36。

16 王正華，〈女人、物品與感官慾望：陳洪綬晚期人物畫中江南文化的呈現〉，《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第 10 期（2002 年 12 月），頁 38。

同時，加拿大漢學家阮思德（Bruce Rusk）在 2020 年演講指出，此書中物料描述存在諸多問題：一是 15 世紀時明宣宗（1425-1435）統治期間海外貿易尚未成形，書中卻羅列各項海外物產作為銅爐材料，如渤泥國產「紫礦石」、「臙脂石」、倭源產「黑、白水鉛」與賀蘭國產「花洋斗錫」等記載，僅見於此書；其次，《大明會典》或故宮文物比對可知，當時廟堂祭器採套組形式，如爐、燭臺、瓶之五供，並非單件鑄造後分配各處，反映此書成書年代不早於清初。其三，阮思德指出，《宣德鼎彝譜》所提「四夷賓服，重譯獻琛而至者三十餘國」及暹羅國進貢良銅等，應是參考「鄭和下西洋」一事，增添宣德爐乃海外珍寶集鑄而成之想像。<sup>17</sup> 據此，阮思德認為《宣德鼎彝譜》的特點，係將輯錄諭令、奏文等文書內容，轉化為藏家的鑑賞指南，他發現與明代嚴嵩（1480-1567）財產沒收清單《天水冰山錄》類似，都採用公文檔案形式，傳借為收藏參考。阮思德甚至指出，透過《宣德鼎彝譜》可窺見一本托古偽作的高明騙術，藉由虛構歷史文件，使讀者於心中自行推測、描摹出一個關於宣德爐的完整幻想。<sup>18</sup>

誠如前述研究指出《宣德鼎彝譜》一類的宣爐指南，導因於明代晚期市場大量出現的宣銅爐，有此需要。研究發現，明正德年間以後，江南殷富，百貨畢具，大批收藏家與古董商人聚集於南京、蘇州、嘉興、杭州等地，成為收藏重鎮。因需要古董人數太多，真品太少，於是出現大量贗品，沈德符（1578-1642）在《萬曆野獲編》所云：「諸大估約千曰百，動輒傾囊相酬，真贗不可復辨。」<sup>19</sup> 而在鑑定方法上，宣德爐上「款識」成為鑑別真偽的重要依據。但如研究指出：「眾多藏家往往依賴這些標誌性信息作為藏品鑑定的法寶。」

17 張嘉倫，〈阮思德談宣德爐的身世之謎〉（2020/8），收錄於《典藏 ARTouch》：<https://artouch.com/art-views/art-history/content-13013.html>（2023/10/8 點閱）。

18 張嘉倫，〈阮思德談宣德爐的身世之謎〉。

19 姚暘，〈明代江南民間藝術收藏中的贗品探析〉，《故宮博物院刊》，第 166 期（2013 年第 2 期），頁 74。

事實上，『款識』、『題跋』最易被偽造，贗品製造者也往往投藏家之所好，在此方面做足功夫」。<sup>20</sup>當然，我們也不應貿然否認宣德年間出現類似造形銅爐之事實，只是這種發展更可能是長時間發展而來的漸變進程，《宣德鼎彝譜》上的記載只是將這長時間的發展，濃縮為宣德 3 年內發生之事件。

從過去研究成果而言，主要集中在宣德爐始鑄年代考證，以及對「宣爐三譜」的內容考訂。而宣爐各時期形制發展，仍以同時代瓷器或器物進行類型學比較。<sup>21</sup>一方面，宣德爐形制研究困難點在於目前研究集中在傳世品，欠缺考古出土材料作為年代與形制參考，且私人或博物館藏品的年代斷定，也多依賴於經驗法則，罕見透過標準化的科學屬性或可供檢視的準則出發；其二、在前述文章或相關出版的圖錄中，其研究對象多以博物館或私人藏品為主，未見專以特定脈絡使用中的傳世宣德爐為研究對象。這些具長時間使用脈絡的宣德爐，往往和寺廟、人群有著長期互動，是研究被「珍稀化」或「收藏化」的宣德爐，進入地方社會的珍貴材料。

### 三、剝開「宣德爐」神話

柯恩 (Paul A. Cohen) 的《歷史三調：作為事件、經歷和神話的義和團》(*History in Three Keys: The Boxer as Event, Experience, and Myth*) 一書，<sup>22</sup>提醒我們「瞭解歷史的意義、探尋並最終認識歷史真相」有三種途徑，即事件 (Event)、經歷 (Experience) 和神話 (Myth)，這也是人們認識和塑造歷史的三個面向。筆者將這三種歷史面向，對應到與宣德爐三種因素，茲整理成下表：

20 姚暘，〈明代江南民間藝術收藏中的贗品探析〉，頁 82。

21 陸鵬亮指出，宣德年間香爐的造型可能以大型朝冠耳鼎式爐，以及直腹弦紋筒形爐二類為主。至於冲天耳乳爐、蚰龍耳爐、獸面耳爐、魚耳爐之形制，則應是晚明出現之器型。陸鵬亮，〈宣爐辨疑〉，頁 70-74。

22 Paul A. Cohen, *History in Three Keys: The Boxers as Event, Experience, and Myth* (N.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8.) 中文譯本見：杜繼東譯，〈緒論：歷史學家重塑的過去〉，《歷史三調：作為事件、經歷和神話的義和團》(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 年)，頁 3-16。

表 1 關於宣德爐論述中的事件、經歷和神話

途徑	內涵	對應宣德爐論述	文獻來源
事件 Event	事件主體是歷史學家，其塑造歷史方式是通過梳理歷史事實，進而理解和解釋過去發生之事，並賦予其相應歷史意義。	明代宣德三年暹羅國進貢風磨銅。	〔明〕呂震撰《宣德彝器譜》（又稱《三卷譜》）
經驗 Experience	經驗主體是歷史親歷者，其塑造歷史方式是「直接創造過去」並在事後將自身經歷，公諸於眾。	鼎彝雖小，所費甚鉅，幾於金玉同價。金玉恆有而宣銅彝傳世頗稀。民間單冶薄鑄何能辦此。倘有得者，當與商彝周鼎共寶。  宣德年鑄薰爐，海內所珍，今多贗物，真者百之一耳，其佳者。	〔明〕祝允明，嘉靖 5 年（1526）引自《宣德彝器譜》  〔明末〕〈改過齋雜記〉
神話 Myth	神話主體是神話創造者，其塑造歷史方式是出於特定的目的而對歷史事實中某些具有象徵意義的資訊加以特殊解讀。	宣鑄多用蠟茶、滲金二色，蠟茶以水銀浸擦入肉，薰洗為之。滲金以金鑠為泥，數四塗抹，火炙成赤，所費不貲。非民間可能彷彿也。  凡銅經鍊五、六次則俱珠光寶色，有若良金矣。宣廟遂敕工匠必十二鍊，每斤得其精者才四兩耳，故其所鑄鼎彝特為美妙。	〔明〕萬曆 19 年（1591）高濂《遵生八箋》  〔明〕天啟 6 年（1626）項子京《宣爐博論》

資料來源：呂震，《宣德彝器圖譜》，頁 4；未知作者，〈改過齋雜記〉，收入陳夢雷編，《古今圖書集成》，第 236 卷，《考工典》，〈爐部雜錄〉，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清雍正銅活字刊本；高濂撰，《遵生八箋》，明萬曆 19 年（1591）雅尚齋刊本；項子京，《宣爐博論》，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840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 年），頁 1066。

就歷史三調中的「事件」(Event)來說，掛名在呂震撰《宣德彝器譜》提及宣德 3 年暹羅國進貢風磨銅一事，在明宣宗實錄未見此事記載；加上呂震於宣德元年已逝，更不可能有鑄爐撰書一事。由此出發，此等故事般有前因後果的事件說法，實為虛妄。在經驗(Experience)部分，則是關於明末時人對宣德爐價值高昂之感嘆，屬於社會觀察或收藏狀態的經驗之談，可信度較高。至於神話(Myth)層面，由於宣德爐價昂且衍生出真爐珍稀的觀念，於是被穿鑿附會成其製作程序如煉丹一般，銅質越煉越精，實有違背物理現象，如同神話一般；加上宣德爐更被附會製作過程成分含有金、銀，也都是被神話化之後衍生的論述。

平心而論，《宣德鼎彝譜》等成書年代雖被質疑，卻也不能反證明代宣德爐純粹是文人想像出來的子虛烏有。在中國文物歷史發展中，經常可發現文獻傳統與物質傳統未必亦步亦趨。北京故宮研究員李米佳指出，青海瞿曇寺一件「宣德二年」款的雙耳活環鎏金銅瓶，應是來自宣德皇帝賞賜，顯示宣德爐的「宣銅」傳統，其來有自。<sup>23</sup> 他認為歷史中宣德爐概念的形成，應是一種漸進過程，而非如同事件(宣德 3 年云云)或故事一般的突然發生。因此，對於認識宣德爐的發展，應先理解塑造宣德爐歷史的論述本身產生年代，通過梳理宣讀爐如何被使用的歷史事實，進而理解和解釋過去發生之事，才能賦予其相應的歷史意義。

換言之，關於宣德爐原始鑄造來龍去脈的「事件」緣由，因吾輩距離當時已數百年之久，已遠離當時的時空脈絡，難以從文獻中蛛絲馬跡追尋到原始面貌。至於「經驗」的部分，我們卻能從它們在歷史中的使用狀況與紀錄理解，特別是來自地方具有明確使用脈絡的宣德爐，更能反映真實狀況。

在臺灣廟宇中屢屢見到器底鑄「大明宣德年製」款識<sup>24</sup>的銅爐，關於這

23 李米佳，《宣德爐研究——故宮藏宣銅器的整理與研究》，頁 8。

24 「款識」第一種解釋係鐘鼎彝器上所刻的文字和花紋，凹者為款，凸者為識；第二種解釋是書畫上的落款和題字。見「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https://dict.revised.moe.edu.tw/dictView.jsp?ID=78399&la=0&powerMode=0> (2023/10/17 點閱)。

些寺廟傳世宣德爐的年代，同樣不能從器底款識作為唯一證據——如同坊間流傳許多落有康熙、雍正、乾隆款識的瓷器，不代表就屬該一時期，應透過寺廟沿革、地方開發史、器表年款……等，提供銅爐年代判讀的背景。根據研究，臺灣傳世宣德爐年代，多數落在 19 世紀後半至 20 世紀前半，並以 20 世紀前半為大宗；甚至有不少宣德爐的年代，更是在 1950 年以後。<sup>25</sup> 這樣的年代落點，與收藏界動輒將宣德爐定為 15 世紀到 17 世紀，年代認知上相去甚遠也。

本研究在前述基礎上進一步指出，臺灣傳世不少宣德爐來自信徒捐獻。爐底除了常見帝王年號款式與私人鑄坊堂號等符號屬性的年代款識，器表上更可見到敬獻者鑄造款與器表鑿刻款。透過爐身外表的鑿刻紀年款，可作為宣德爐年代判讀依據，可突破現階段宣德爐年代辨識的各自表述、眾說紛紜之情況，具有年代落點判讀上的可信度。

## 貳、臺灣傳世紀年款的宣德銅爐

臺灣傳世宣德爐數量頗多，多數器底雖見「大明宣德年製」款識，但真正有紀年款者不多。以下就筆者田野採集或收集到紀年款宣德爐，按年代先後次序分別說明。

### 一、嘉慶時期

金門縣金湖鎮文物普查案發現，太武山海印寺藏有一件沖耳爐（圖 4）。<sup>26</sup> 銅爐黝黑，爐底有「嘉慶拾捌年仲春鳳山知縣吳性誠鳳儀書院」款。查閱文獻得知，吳性誠（?-1826）字樸庵，清湖北黃安人，為廩貢出身，捐得縣丞職務。嘉慶 17 年（1812）七月護理臺灣府糧補海防通判，嘉慶 17 年

25 李建緯，〈臺灣寺廟現存「宣德爐」形制、年代與功能〉，頁 162-217。

26 李耀明主持，《108-110 金門縣金湖鎮宮廟宗祠文物普查建檔計畫修正版報告》（金門：金門縣文化局委託，宜誠資訊股份有限公司，2021 年），頁 11-18。

代理澎湖通判，嘉慶 19 年（1814）署鳳山縣知縣，其後分別署彰化縣知縣、鳳山縣知縣、兼署臺灣府北路理番鹿仔港海防捕盜同知、臺灣府淡水撫民同知。道光 5 年（1825）因病辭職，不久即卒。

此爐底見嘉慶 18 年（1813）之款（圖 6）。鳳儀書院出現之前，鳳山僅見屏山書院，張廷欽所撰〈鳳儀書院木碑〉提到：「邑舊治有屏山書院，延山長以課生童。置產，歲得息金二百餘，供脩脯，官司之。兵燹之後，變為邱墟。嗣縣署移建於茲，未遑修舉。」至於鳳儀書院，則是吳性誠署鳳山縣



圖 4 金門海印寺嘉慶年款沖耳宣德爐

資料來源：李建緯主持，《113-114 年金門縣太武山海印寺及後浦靈濟古寺文物調查研究計畫案成果報告書》。（金門：金門縣文化局委託、逢甲大學文化資產與文物保存研究中心執行，2025 年），頁 20、圖 2-13。



圖 5 金門海印寺嘉慶年款宣德爐蓮瓣形底座照片

資料來源：李建緯主持，《113-114 年金門縣太武山海印寺及後浦靈濟古寺文物調查研究計畫案成果報告書》，頁 20、圖 2-15。



圖 6 金門海印寺嘉慶年款沖耳宣德爐底部款識

資料來源：李建緯主持，《113-114 年金門縣太武山海印寺及後浦靈濟古寺文物調查研究計畫案成果報告書》，頁 22、圖 2-17。

知縣的 1814 年之際，由諸生倡建該書院。此爐款式「嘉慶拾捌年」（1813），比文獻記載嘉慶 19 年（1814）倡建鳳儀書院，還早了一年。啟人疑竇的是，此件署名「鳳儀書院」與「鳳山知縣」的宣爐，為何出現在金門海印寺？

這件嘉慶 18 年款的宣德爐，根據鑄造工藝痕跡判斷，爐身係由多數鑄件焊鑄而成。這在過去研究認識宣德爐以失蠟法為主的工藝，<sup>27</sup> 是未曾見過的成形技法。

為了瞭解這件銅爐是否為近代仿品，筆者詢問民間知名的銅爐收藏古董商張豪耿先生。根據其表示，這類銅爐大約是民國 70~80 年代製作，係使用模具翻模。因此外表並無早期宣德銅爐所呈現皮色的精光內斂感。他同時表示，這類銅爐經他手邊交易超過 10 件以上，是大量生產的現代製品；換言之，根據傳世材料比對，這件銅爐係現代贗品。

27 張光遠，〈大明宣德爐〉，頁 4-16。



圖 7 民間知名銅爐古董商張豪耿先生，提供他手上樣品，款識與海印寺完全一樣

資料來源：張豪耿提供。

## 二、咸豐時期

北港朝天宮有兩件有年款宣德爐。第一件係蚰龍耳宣德爐，爐身有「咸豐甲寅年」（咸豐 4 年，1854）雙勾陰刻款（圖 8）。該爐器型飽滿比例勻稱，銅爐皮色呈現自然氧化與風化現象，款識也都相當清晰，顯示係以失蠟法鑄造，標準清代中晚期宣德爐。在一張北港朝天宮日治時代的照片中（圖 9），也可見此件蚰龍耳爐供在觀音殿供桌上，顯示是廟內早期真正使用的供器。



圖 8 北港朝天宮咸豐 4 年（1854）款，晉邑□□萱、□□恭敬敬謝

資料來源：筆者拍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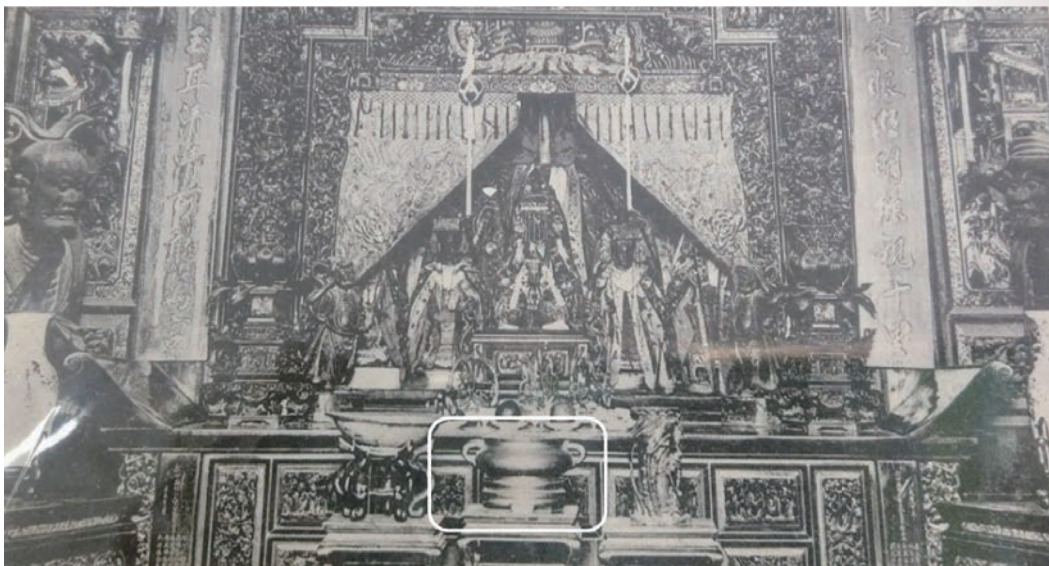


圖 9 日治時代北港朝天宮後殿觀音殿蚰龍耳宣德爐

資料來源：北港朝天宮紀仁智組長提供。



圖 10 北港朝天宮萬年香火爐，高 29 公分，背面為咸豐丁巳年（1857）  
吉旦，深滬弟子等敬獻

資料來源：筆者拍攝。

第二件係知名的萬年香火爐（圖 10）。此爐從爐耳判斷，屬蚰龍耳爐，圓形銅爐，現代的爐蓋把手做成蝙蝠造形。正面浮鑄「萬年香火」四字，背面則鑄有「朝天宮」，落款「咸豐丁巳年（1857）吉旦」、「深滬弟子翁載恭、王源炉、翁長興、黃懷抱仝扣」，「朝天宮」外裝飾以書卷卍字不斷紋。此爐因與重要民俗「北港朝天宮迎媽祖」，和其它縣市登錄民俗如白沙屯拱天宮、臺中大庄浩天宮、大甲鎮瀾宮等有關，是媽祖刈火重要的神聖器具。因此 2018 年 2 月 2 日被指定為雲林縣一般古物（府文資二字第 1073800872B 號）。<sup>28</sup>



圖 11 日治時代北港朝天宮正殿媽祖殿前萬年香火爐

資料來源：北港朝天宮紀仁智組長提供。

萬年香火爐上紀年款銘文，屬鑄造前訂製款，與臺灣其它傳世宣德爐採後加鑿刻款的上字方式不同；器底亦未見「大明宣德年製款」，但有一圓圈鑄造痕跡。在另一張臺南國清寫真館發行的北港朝天宮日治時代照片，已可見此件蚰龍耳爐供在正殿供桌上（圖 11），此蚰龍耳爐一直沿用至現代。

28 未著撰人，〈北港朝天宮萬年香火爐〉，收錄於「國家文化資產網」：<https://nchdb.boch.gov.tw/assets/overview/antiquity/20180604000002>（2023/10/10 點閱）。

臺南德化堂傳世文物保存 2 件宣德爐，較大的一件是蚰龍耳爐，附帶銅座（圖 12）；另一件則是罕見的夔龍耳爐，高度僅約 7 公分（圖 13）。



圖 12 臺南德化堂藏蚰龍耳爐，咸豐年間的《恭記德化堂聖跡》已提到宣德爐  
資料來源：李博揚拍攝。



圖 13 臺南德化堂藏夔龍耳爐，咸豐年間的《恭記德化堂聖跡》已提到此爐  
資料來源：李博揚攝。

根據一份咸豐 6 年（1856）由僧人普恩所撰之〈恭紀德化堂聖跡〉（圖 14），提及德化堂有 6 件宣爐。<sup>29</sup> 顯示這批銅爐年代下限是 1856 年。德化堂內多數供器，係該堂於道光 17 年（1837）建堂以後所置，可視為該組銅宣爐的年代上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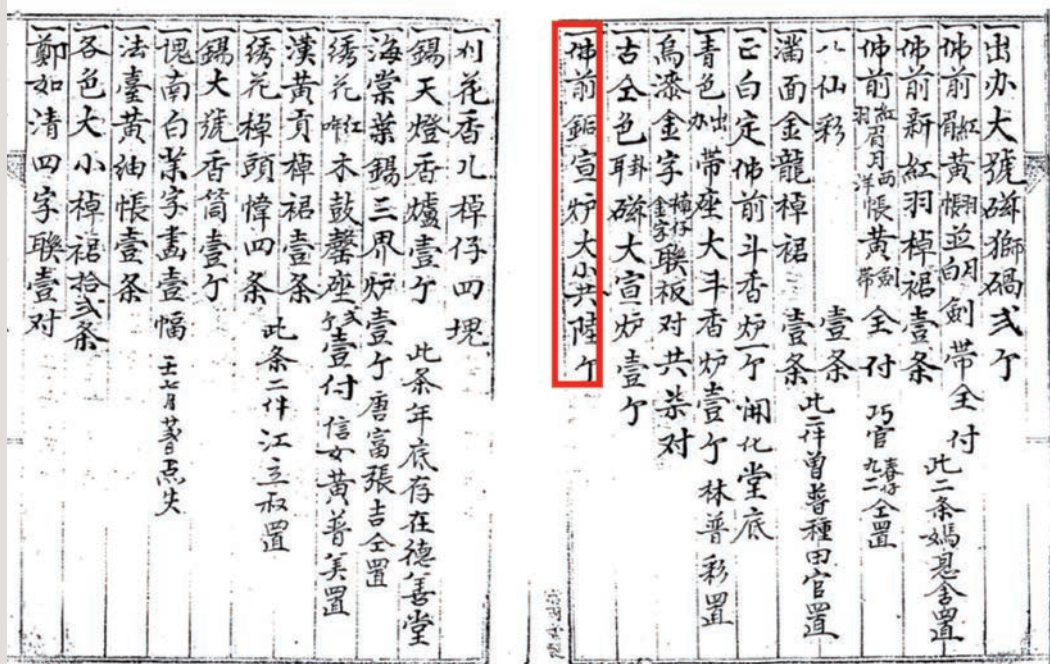


圖 14 普恩所撰咸豐 6 年（1856）間的〈恭記德化堂聖跡〉，文中提到德化堂原來應該有 6 個銅宣爐  
資料來源：普恩，〈恭記德化堂聖跡〉，頁 311-312。

### 三、光緒時期

頭份義民廟蚰龍耳爐（圖 15），爐身正面陰刻「頭份庄義民宮」。爐底有「光緒十四年（1888）十月」與「信士黃裕豐敬奉」。另有六字方款之「大明宣德年製」款識。廟方保存於辦公室保險櫃。<sup>30</sup> 頭份義民廟於光緒 18 年

29 普恩，〈恭記德化堂聖跡〉，收入王見川、王惠琛主編，《臺灣老齋堂的珍寶：臺南德化堂所藏的經卷與文獻·第一冊》（新北：博揚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8 年），頁 311-312。

30 蔡金鼎主持，《苗栗縣頭份鎮等六鄉鎮古文物普查計畫成果報告書》（苗栗：苗栗縣政府文化觀光局委託，嵐厝創意企業社執行，2015 年），頁 448-449。

(1886)興工，供奉自新竹縣新埔義民廟分靈，現今鋼筋混凝土的現貌，係1971年改建。



圖 15 頭份義民廟光緒 14 年（1888）款蚰龍耳爐

資料來源：蔡金鼎主持，《苗栗縣頭份鎮等六鄉鎮古文物普查計畫成果報告書》，頁 448-449。

臺南首廟天壇一件歷經耳宣德爐，曾發表於《府城道教廟宇文物集》（圖 16）。<sup>31</sup>歷經爐也稱「押經爐」，《宣德彝器圖譜·卷十七》載，該造形係取自宋定窯高腳押經爐，一說認為它是作為佛教用器，實際上臺灣民間寺廟也用。在國清寫真館昭和 7 年（1932）出版的《全臺寺院齋堂名蹟寶鑑》中，有不少這類爐具的身影。



圖 16 臺南首廟天壇歷經耳爐

資料來源：冀甯道人、郭瑞雲編著，《府城道教廟宇文物集》，頁 6。

31 冀甯道人、郭瑞雲編著，《府城道教廟宇文物集》（臺南：清流出版社，1988 年），頁 6。

臺灣廟宇所見壓經耳宣德爐造形則有兩式，一式係三足為造形者；另一式則為以圈足為主，至於《宣德彝器圖譜》所載的壓經爐，都是三乳足爐，顯示乳足要比圈足年代早。《府城道教廟宇文物集》圖版觀察天壇該件壓經耳宣德爐，爐器身正面刻有「玉皇上帝」四字；器身一側有「光緒（癸）巳年」（1893），可知為 19 世紀晚期製品。

#### 四、明治時期

宜蘭碧霞宮透過文物普查發現一件壓經耳爐（圖 17），附蓮瓣型銅座。<sup>32</sup> 上款「丙申年桐月穀旦」，下款「門下張榮藩謝」。爐身有「碧霞宮」「精忠岳王」。根據張泗福研究，「張榮藩」曾是光緒 21~22 年（1895-1896）的扶鸞者，故此丙申年應是建立鸞堂之年，即明治 29 年（1896）。<sup>33</sup> 從照片觀察此件銅爐，口緣器壁內側內收而變薄，且爐底的蓮瓣銅座器壁，也有變薄之趨勢。



圖 17 宜蘭碧霞宮明治 29 年（1896）壓經耳爐

資料來源：葉俊麟主持，《110-112 年宜蘭縣百年寺廟文物普查計畫（一）委託案成果報告書》，頁 383，照片 6-429。

32 葉俊麟主持，《110-112 年宜蘭縣百年寺廟文物普查計畫（一）委託案成果報告書》（宜蘭：宜蘭縣文化局委託，中原大學執行，2023 年），頁 383。

33 張泗福，〈「宣德爐」在臺灣二十世紀供器中的身影〉（臺中：逢甲大學歷史與文物研究所碩士論文，2023 年），頁 17。

## 五、大正時期（民國初年）

屏東大樹房觀林寺沖耳爐（圖 18、19），口徑 30.3、腹徑 34.2、高 21.7 公分，重 7,500 公克，是目前臺灣已知最大的沖耳爐，目前仍使用中，為正殿供桌前插線香用。其外觀為鬲形，器腹以陰線刻 6 行右讀 24 字「浙臺黃邑 王慶麟妻 石氏率男 憲增敬獻 民國二年二月日立」款（圖 20），器底減地陽刻三行右讀六字「大明宣德年製」款印，款文「德」字寫法「心」上少一橫，與一般明清傳世品相同。<sup>34</sup>

該件宣爐兩側沖耳與後二足平行對應，符合年代較早宣爐造形。唯廟方將背面當成正面，其正確的擺設方式應是一足在前、二足在後：貢獻者的落款應當成銅爐背面，否則祭祀時就如同祭拜供奉者。關於此爐來源，據廟方表示係普陀山進香時從寺僧處購得。<sup>35</sup> 因此原來不屬臺灣的寺廟供器，是中國大陸 20 世紀初的寺廟文物。



圖 18 觀林寺民國 2 年（1913）款沖耳爐

資料來源：盧泰康、李建緯，《文物觀自在：恆春大光里觀林寺文物調查研究》，頁 81-82。

34 盧泰康、李建緯，《文物觀自在：恆春大光里觀林寺文物調查研究》（屏東：大樹房觀林寺，2021 年），頁 80。

35 盧泰康、李建緯，《文物觀自在：恆春大光里觀林寺文物調查研究》，頁 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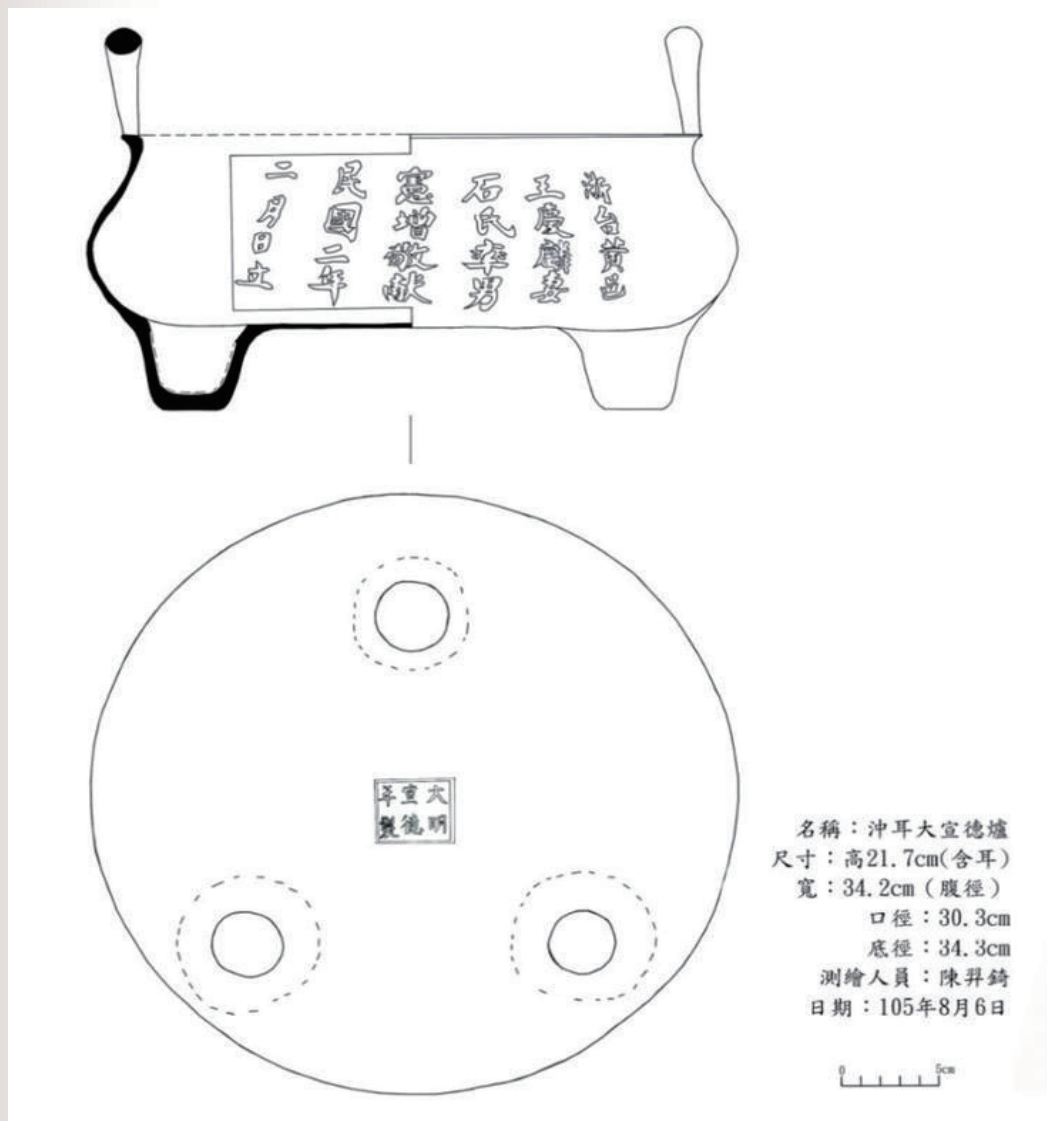


圖 19 觀林寺沖耳爐線繪圖

資料來源：盧泰康、李建緯，《文物觀自在：恆春大光里觀林寺文物調查研究》，頁 8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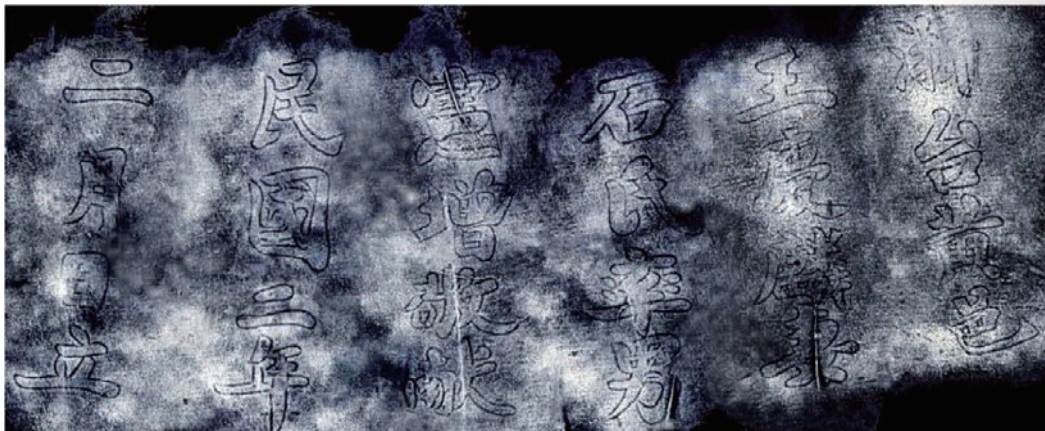


圖 20 觀林寺民國 2 年款沖耳爐陰刻款

資料來源：盧泰康、李建緯，《文物觀自在：恆春大光里觀林寺文物調查研究》，頁 81。

位於澎湖鄰近馬公的湖西中寮代天宮，宮內一件歷經耳爐（圖 21、22），爐身中央「五府王爺」，上款明確陰刻「大正拾壹年旧正月拾五日吉但（筆者按：旦）」；下款則為「本鄉弟子翁軒答謝」。<sup>36</sup> 此爐雖屬宣爐系統同爐，爐底卻未見大明宣德年製款。由於中寮代天宮於大正 10 年（1921）重建，因此此爐係重建隔年所添置。



圖 21 中寮代天宮大正 11 年（1922）款歷經耳宣德爐

資料來源：王嵩山主持，《澎湖縣百年歷史廟宇及教堂文物普查計畫（三）成果報告》，頁 330。

36 王嵩山主持，《澎湖縣百年歷史廟宇及教堂文物普查計畫（三）成果報告》（澎湖：澎湖縣政府委託，逢甲大學亞太博物館與文化研究中心執行，2018 年），頁 329-330。



圖 22 中寮代天宮大正 11 年款歷經耳宣德爐爐底，未見款識

資料來源：王嵩山主持，《澎湖縣百年歷史廟宇及教堂文物普查計畫（三）成果報告》，頁 330。

澎湖東甲北極殿，根據《臺灣縣志》記載「上帝廟，在媽祖廟之東。康熙 29 年（1690），澎湖左營守備趙廣建。56 年（1717），左營游擊陳國瓚重修。」<sup>37</sup>，顯示此廟在康熙中期已存。該銅爐最早曾發表於〈臺灣寺廟所見「宣德爐」年代與工藝試析〉一文（圖 23）。<sup>38</sup> 其外觀呈黃銅色，平口束頸圓腹，其下三乳足，雙耳為歷經耳，口沿刻「北極殿」，雙耳正面有陰刻款，左耳刻「大正壬戌年孟秋鑄」（1922），右耳刻「炉下弟子藍木敬獻」。器表因鑄造時銅液分布不均而有砂眼的現象，反映出係使用失蠟法造成的工藝痕跡。外表因長年使用而泛黑，而爐座同樣是銅質，作蓮瓣三足造形。此爐器底有方印款識「辛酉澎湖藍木工場製」。

關於藍木確有其人：藍木係第 23 世，為藍瑞之孫，字永茂，生於同治

37 陳文達編纂，方豪編輯，《臺灣縣志》（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1 年），頁 216。

38 本篇原本由李建緯發表於 2013 年 9 月 28 日臺中逢甲大學主辦之「近代物質文化研究：第一屆歷史與文物學術研討會」，後改寫為〈臺灣寺廟現存「宣德爐」形制、年代與功能〉，收入李建緯，《歷史、記憶與展示：臺灣傳世宗教文物研究》，頁 162-217。

11 年（1872），為澎湖廳東西澳文澳鄉人，卒於昭和 17 年（1942），葬在澎湖馬公草仔尾第一公墓。<sup>39</sup>



圖 23 東甲北極殿壓經三乳足爐

資料來源：王嵩山、李建緯主持，《澎湖縣百年歷史廟宇及教堂文物普查計畫（一）成果報告》（澎湖：澎湖縣政府，2016 年），頁 257。

嘉義市新厝仔炳靈宮，地方傳說五顯大帝係由新厝庄陳氏祖先於清雍正 5 年丁未年（1727）自大陸攜來臺灣。另根據《嘉義市志》記載，則是新厝庄陳氏祖先於清末攜帶香火赴臺。初期五顯大帝暫奉於新厝庄私塾內。1966 年新厝里里長陳宗發起建廟，陳榮等捐地、捐錢助成。其後經 1979 年、1994 年二次修整，形成今日之廟貌。<sup>40</sup> 根據寺廟陳柏宏陳述，2024 年 10 月整理發現廟內一件燻黑宣德爐（圖 24），清開燻黑層後發現有款，正面「五顯大帝」，上款「大正壬戌年九月」（1922 年）；下款則為「埤仔頭庄林冉謝」，以雙勾陰線鑿刻。而底部的「家藏珍寶」四字篆體方款，則是臺灣傳世宣德爐中比較少見寫法，屬於私人堂號鑄款，僅見於彰化元清觀的戟耳爐。<sup>41</sup> 透過爐身中央神明名稱來看，此爐確屬五顯大帝廟之文物。

39 李建緯，〈澎湖馬公傳世金屬香爐研究〉，《民族學研究資料彙編》，第 27 期（2019 年 12 月），頁 32。

40 顏尚文等編，《嘉義市志·卷十·宗教禮俗志》（嘉義：嘉義市政府，2005 年），頁 93。

41 李建緯，〈臺灣寺廟現存「宣德爐」形制、年代與功能〉，頁 203-204。



圖 24 嘉義市新厝仔炳靈宮五顯大帝廟大正壬戌年（1922）蚰龍耳宣德爐；  
右圖為款識特寫

資料來源：筆者拍攝。

關於其製作工藝，爐身字體係以金屬鑿頭透過雙鉤陰線刻方式勾勒，「五顯大帝」幾個字體內，更以圓鑿頭填滿細魚子紋（圖 25）。爐耳係另外焊接，觀察爐身與圈足係一體成形，圈足上發現許多平行旋紋（圖 25），懷疑係以車床方式將整塊銅料旋切成形，與一般宣德爐採失蠟法製作之認識，有所出入。

澎湖馬公五德威靈宮，根據 1969 年「威靈宮重建記」記載建於道光 27 年（1847）；大正 2 年（1913）時重修，大正 11 年的「威化社嚴善堂」開堂；目前廟貌則是 1967 年發起重建，隔年完工。五德威靈宮蚰龍耳爐（圖 26）正面中行白描陰刻「保生大帝」，上款「大正十二年癸亥置」（1923）、下款「本社弟子吳前敬奉」。圈足內有方款「大明宣德年製」，德字心上無一，製字「制」與「衣」上一點同一劃。最重要的是，此爐附有明確紀年。



圖 25 嘉義市新厝仔炳靈宮五顯大帝廟大正壬戌年（1922）蚰龍耳宣德爐，  
爐身鑿刻字體與圈足上的平行旋紋  
資料來源：筆者拍攝。



圖 26 澎湖馬公五德威靈宮，大正 12 年癸亥（1923）蚰龍耳宣爐  
資料來源：王嵩山、李建緯主持，《澎湖縣百年歷史廟宇及教堂文物普查計畫  
（二）成果報告》（澎湖：澎湖縣政府，2017 年），頁 209。

## 六、昭和時期

臺南大天后宮蚰龍耳宣德爐（圖 27），通高 12 公分，色澤偏淡黃，表面光亮無鏽痕，目前陳設於拜殿供桌上。爐作鼓腹之簋形，雙耳位於爐身對稱兩側。惟因無法拍攝器底，無從得知是否存有宣德年款。透過器身陰刻之「馬沙溝庄謝」、「昭和參年夏」字樣，可知本器為西元 1928 年的製品。



圖 27 蚰龍耳爐，昭和 3 年（1928）款，臺南大天后宮藏  
資料來源：李建緯拍攝。

嘉義震安宮蚰龍耳宣德爐（圖 28），此爐尺寸直徑 18（外）/16（內）公分，高 12.5 公分，最寬 26.5 公分，厚 1.1 公分。此爐為銅質，兩側為蚰龍耳，平口，短頸，圓腹，圈足，足與耳為鑄接於爐身，底有陽文「大明宣德年製」（圖 29），「德」字心上無一橫，爐壁厚，上手沉重，表面有鑿刻字款，為「昭和十二年春」（1937）、「鎮南聖神宮」，表面與內部有明顯使用痕跡。此爐收於內殿，保存狀況穩定良好，底座則為另加，整體保存狀況良好。



圖 28 嘉義震安宮昭和 12 年款蚰龍耳宣德爐；右圖為年款特寫  
資料來源：郭肯德拍攝。



圖 29 嘉義震安宮昭和 12 年蚰龍耳爐底部款識  
資料來源：郭肯德拍攝。

北港朝天宮歷經耳爐（圖 30），爐身右款鑿刻「昭和十一年」（1936），中央有「張游氏阿市」，左邊豎排字體「答謝 豐原街」。這位張游阿市，同樣出現在臺中霧峰護國寺歷經耳爐（圖 31），其爐底見「大明宣德年製」

六字方款，上款為「昭和拾二年歲丁丑吉旦」，下款為「張游氏阿市答謝」。



圖 30 北港朝天宮昭和 11 年款壓經耳爐

資料來源：筆者拍攝。



圖 31 臺中霧峰護國寺昭和 12 年款壓經耳爐

資料來源：張泗福提供。



圖 32 新竹長和宮昭和 13 年款壓經耳爐。爐身正面有天上聖母，其中一耳有戊寅年桐月之年款

資料來源：林仁政提供。

長和宮壓經耳圈足爐（圖 32），底部「大明宣德年製」六字方款，則屬宣德爐中常見之款識。耳上「戊寅年」有光緒 4 年（1878）、昭和 13 年（1938）與 1998 年可能。1987 年出版的《全國佛刹道觀總覽》天上聖母（中冊）已見此爐，故其可能年代為清晚期至日治時代。由於清代常見壓經耳宣德爐爐耳未如此爐厚實，造形亦較典雅，因此以昭和 13 年為可能年代。<sup>42</sup>

42 李建緯，〈臺灣寺廟現存「宣德爐」形制、年代與功能〉，頁 181-182。

## 七、戰後民國時期

左營舊城城隍廟蚰龍耳爐（圖 33），「左營舊城」、「民國三十五年桂月置」款之蚰龍耳宣德爐。另一側贊助人「左營弟子黃條枝叩謝」。爐底「玉堂珍玩」四字篆體款。該爐器壁極薄，與一般傳世清代中晚期宣爐爐器壁較厚不同。



圖 33 左營舊城城隍廟 1946 年款蚰龍耳爐

資料來源：筆者拍攝。

宜蘭碧霞宮一件獅首耳爐（圖 34）。爐身中央為「碧霞宮」三字，上方有「岳武穆王八五三年誕辰紀念」，爐座陰刻「宜蘭縣議會 宜蘭水利委」



圖 34 宜蘭碧霞宮 1956 年獅首耳爐

資料來源：葉俊麟主持，《110-112 年宜蘭縣百年寺廟文物普查計畫（一）委託案成果報告書》，頁 383。

員會敬獻」。<sup>43</sup> 根據張泗福研究，岳飛誕生於北宋崇寧 2 年（1103），誕生第 853 年應為 1956 年，當為此爐敬獻年代。<sup>44</sup>

澎湖前寮朱王廟一件獅首耳爐（圖 35），侈口、束頸、垂腹，圈足外敞，底部與雙獅鈕以鐸接結合爐身，獅口側有孔，原應有環。器底有六字方款「大明宣德年製」，惟印與爐身正面無對應，與傳世印、爐身是垂直的做法不同，顯示是近代製品。



圖 35 前寮朱王廟獅首耳銅香爐，1961 年。通高 23.6 公分

資料來源：王嵩山、李建緯主持，《澎湖縣百年歷史廟宇及教堂文物普查計畫（二）成果報告》，頁 101。

這種獅鈕器底鑄「大明宣德年製」款銅爐，常被廟方視為具有數百年歷史之物證。<sup>45</sup> 不過，朱王廟該爐字款可能係以沖床製作，另此爐殘留有一紅字年款「辛」字。前寮朱王廟這類薄胎獅首銅爐，可茲比對的是泰山顯應祖師廟（圖 36）以及臺南市集福宮的銅爐，二器皆鑄有「民國辛亥年」陽字款，即 1971 年製作；彰化市天后宮有「庚子年元月」、「彰化市民生路三號李榮萃、□□訪敬贈」之款（圖 37），為 1960 年。同樣是在澎湖，湖西潭邊

43 葉俊麟主持，《110-112 年宜蘭縣百年寺廟文物普查計畫（一）委託案成果報告書》，頁 383。

44 張泗福，〈「宣德爐」在臺灣二十世紀供器中的身影〉，頁 25-26。

45 李建緯，〈臺灣寺廟現存「宣德爐」形制、年代與功能〉，頁 163。

東明宮收藏的獅首耳宣德爐（圖 38），其器表也鑿刻有民國 1966 年之款。



圖 36 泰山顯應祖師廟，爐身有「民國辛亥年」陽字款。

資料來源：筆者拍攝。

圖 37 獅首耳爐，彰化市天后宮藏，下為獅首造形。

資料來源：筆者拍攝。

圖 38 潭邊東明宮獅首耳爐（1966 年款）。

資料來源：王嵩山主持，《澎湖縣百年歷史廟宇及教堂文物普查計畫（三）成果報告》，頁 354。

臺南省躬社聖化堂 2 件獅首耳爐，皆為獅首銜環，其中一件有款「己酉年季冬」（1969），中央鑿刻「聖化堂」、下款為「周天吉、周薛上敬獻」；爐底「大明宣德年製」款。另一件中央刻有「省躬社聖化堂」（圖 39），上款「□亥年夏月吉製」，下款為「蘇文賢、□水□、蘇清旭仝叩」，造型完全一致，推測應為辛亥年（1971）。最重要的是背後鐫有楷體「台南市西

門路光榮鏡店出品」。<sup>46</sup> 此件為臺灣在地作坊製作銅爐的明確證據。



圖 39 臺南省躬社聖化堂獅首耳爐刻有「台南市西門路光榮鏡店出品」，為明確臺灣本地生產之證據

資料來源：筆者拍攝。

這類民國年款的獅首耳爐，因應戰後信徒人數變多，多作神明爐插線香用，因此容量變大，器壁也因鑄造技術改變，朝向節省銅料而往更薄發展；獅首不論銜環與否，則是以焊接或螺絲固定在爐身。

## 八、小結

觀察前述臺灣傳世宣德爐紀年款與形制，清代宣德爐全落在 19 世紀中葉以後，未見 18 世紀或早於 18 世紀者，其種類有蚰龍耳爐（北港朝天宮，1854、1857；德化堂，1856 年；頭份義民廟，1888）、壓經耳爐（首廟天壇壓經耳爐，1893）與夔龍耳爐（德化堂，1856），其中以蚰龍耳爐數量較多。

日治時代宣德爐則見壓經耳爐（宜蘭碧霞宮，1896；湖西中寮代天宮，1912；東甲北極殿，1922；臺中護國寺，1937；新竹長和宮，1938）、蚰龍耳爐（馬公五德威靈宮，1923；嘉義市新厝仔炳靈宮五顯大帝廟，1922；臺南大天后宮，1928；嘉義震安宮，1937）和沖耳爐（觀林寺，1913）。數量

46 葉仲霖，〈台南市南區省躬社聖化堂「法會圖軸」調查研究〉（臺南：國立臺南藝術大學藝術史學系暨藝術史評與古物研究碩士論文，2024 年），頁 95、97。

上以壓經耳爐為主。

戰後中華民國政府遷臺以後，宣德爐種類有蚰龍耳爐（左營舊城城隍廟 1946）、獅首耳爐（宜蘭碧霞宮 1956，彰化內天后宮 1960，澎湖前寮朱王廟 1961，新北泰山顯應祖師廟 1971，臺南市集福宮 1971）。這時期幾乎一面倒的以獅首耳爐數量為多。

透過上述紀年款宣德爐來看，19 世紀臺灣流行的是蚰龍耳爐；日治時代則流行壓經耳爐與蚰龍耳爐；至於中華民國政府遷臺以後，則以獅首耳爐為主（圖 40），從時間軸來看，不同時段似有不同種類宣德爐流行的偏好。再透過臺南省躬社聖化堂獅首耳爐落款「台南市西門路光榮鏡店出品」發現，這類獅首耳銅宣爐已落地生根，由臺灣本地自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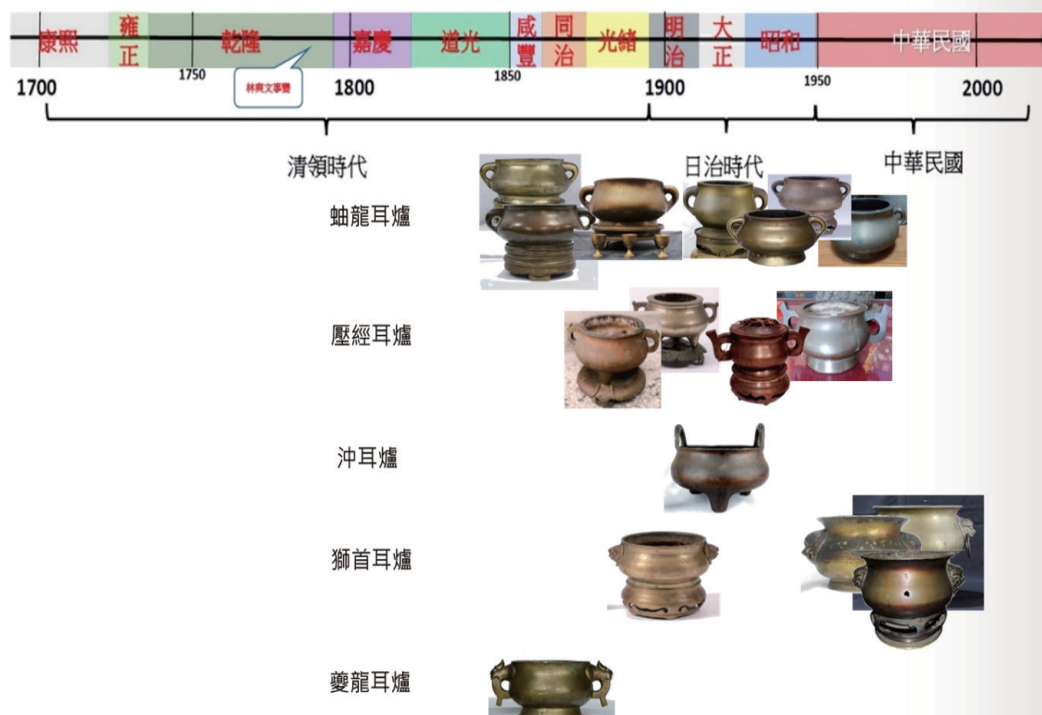


圖 40 臺灣紀年款宣德爐的種類與年代範圍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針對上述的現象，究竟多大程度反映臺灣宣德爐真實使用情況與年代範圍？不可諱言，日治時代日本發布〈金屬回收令〉，對臺灣銅爐應造成不可抹滅的浩劫。在諸多金屬回收作為中，不排除也將鑿刻早期紀年款或年代屬清代前期的宣德爐回收銷熔，致使臺地紀年款的宣德爐數量稀少。<sup>47</sup> 但另一方面，更可能是文化地緣問題：由於臺灣地處華人文化圈的邊陲，基於文化傳播係從中心到周邊的邏輯，銅爐上紀年款所反映的年代，理應比中國大陸宣德銅爐實際年代要晚。同時，這類銅爐屬高檔供器，臺灣早期民間經濟條件差，香爐材料選擇上常以就地取材的石頭、木頭為主。職是之故，導致臺灣宣德爐流行年代落在 19 到 20 世紀前半葉。因此，要證明宣德爐是否存在「宣德真爐」，還需有更明確的證據。

## 參、臺灣傳世宣德爐成分分析

### 一、關於宣德爐金屬成分的認識

除了紀年款，另一種文物年代判斷方式便是從成分判別，特別是銅器鑄造中的銅、鋅、錫等金屬比例，隨時間發展而有成分上的差異。黃銅在中國古代稱為「鎔」或「鎔石」，也稱「倭元」、「委元」、「沃緣」；日本稱「亞鉛」、「白鎔」；西方稱 Tutenague。<sup>48</sup>

一般理解，宣德爐是銅鋅合金的黃銅。該名詞最早出現在公元 4 世紀的《拾遺記》中，原指稱具金屬光澤的黃色硬石，如黃鐵礦或黃銅礦。其後由

47 張泗福，〈「宣德爐」在臺灣二十世紀供器中的身影〉，頁 58-70。

48 賴惠敏，〈清宮的黃銅〉，《乾隆的百寶箱》（新北：八旗文化出版社，2023 年），頁 243-244。

於黃銅顏色相近，故可能因此稱為鑰石。<sup>49</sup> 宋代文獻中已有冶煉黃銅記載，主要是用赤銅和爐甘石（含有鋅的礦石）煉製；至於金屬鋅的提煉，大抵上在明代已有明確記錄，如宋應星《天工開物》提到「升煉倭鉛」，「倭鉛」即是金屬鋅。《天工開物》記載如下：

凡倭鉛，古書本無之，乃近世所立名色。其質用爐甘石熬煉而成，繁產山西太行山一帶，而荆衡為次之。每爐甘石十斤裝載，入一泥罐內，封裹泥固，以漸研乾。勿使見火，拆裂然後逐層用煤炭餅墊盛。其底鋪薪，發火鍛紅罐中，爐甘石鎔化成團，冷定毀罐取出，每十耗去其二，即倭鉛也。此物無銅，收伏入火即成煙飛去，以其似鉛而性猛，故名之曰倭云。<sup>50</sup>

明代金屬鋅提煉成功後，自 16 世紀以後便向歐洲輸出。賴惠敏研究指出，18 世紀從中國出口的 Tutenague，實非純鋅，而係銅鋅合金，其成分為紅銅 55~65% 間、鎳 15~20%、鋅 20~25% 間。除了歐洲，日人也使用中國進口的鋅製成銅鋅器物，並回銷給中國。<sup>51</sup> 黃銅器依成分不同有不同等級：含鋅、銅各半或鋅六銅四，稱「鑄器低者」；鋅三銅七則稱「三火黃銅」或「四火熟銅」，是比較高級的黃銅器。<sup>52</sup>

關於中國古代黃銅器的銅鋅比例，〈中國古代黃銅製品與冶煉技術的研究狀況分析〉一文分析新石器時代仰韶文化到元代元上都遺址出土的 17 件黃銅器，發現從西安姜寨仰韶文化遺址的鋅 25.7% 與 32%、到西周時代山

49 北京鋼鐵學院《中國古代冶金》編寫組，《中國古代冶金》（北京：文物出版社，1978 年），頁 89。

50 宋應星，《天工開物卷下·五金第十四·附倭鉛》，收錄於「維基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畫」：<https://ctext.org/wiki.pl?if=gb&chapter=429139>（2024/6/25 點閱）。

51 賴惠敏，〈清宮的黃銅〉，頁 246-247。

52 北京鋼鐵學院《中國古代冶金》編寫組，《中國古代冶金》，頁 90-92。

東的銅器，含鋅量在 10% 以上，不僅成分差異大，又含有鐵、鉛、錫、硫等雜質，應是含鋅共生礦或混合礦冶煉而來，屬原始冶煉偶得產物。而西元 4 世紀新疆營盤墓地到 13 世紀元上都遺址的器物，含鋅量則在 17%~30%，部分含 3%~9% 的鉛和雜質鐵，夾雜少量銀和銻，顯示冶煉原料不是純銅和純鋅，係以銅與鋅礦石合煉而來。到了明代以後，已將黃銅大量運用於鑄造錢幣，並誕生煉鋅術，黃銅器數量更多：例如明代渾儀中的六合儀、三辰儀測量件成分，其銅 74.0%~85.8%、鉛 6.6%~19.6%、鋅 3.7%~12.0%。例如北京古觀象臺的清代天文儀器，均屬黃銅或鉛鋅黃銅，平均含鋅量為 27.6%，高於渾儀的含鋅量，代表清代黃銅已穩定而大量的使用。<sup>53</sup>

回到宣德爐成分。英國維多利亞博物館館藏的「宣德年款」銅爐經分析後發現，其主要成分為黃銅，其中鋅的含量高達 28% 至 35%。研究者認為，中國獨立提煉鋅的時間大約在 17 世紀或更晚，因此 Rose Kerr（柯蘿絲）在《晚期中國青銅器》（*Later Chinese Bronze*）推測這些「宣德爐」可能是明代晚期至清初康熙年間的作品。<sup>54</sup>

北京故宮博物院的李米佳則針對北京故宮所藏一批「宣德爐」進行分析，發現不同時期的作品鋅含量各異：明宣德年間約為 11% 至 15%，明末則下降至 2% 至 7%，康熙年間為 6% 至 7%，雍正年間升至 7% 至 11%，乾隆時期達 17%，嘉慶年間則介於 17% 至 18%。<sup>55</sup> 與北京故宮的檢測數據相比，維多利亞博物館「宣德爐」的鋅含量（28% 至 35%）顯著偏高，且與傳統認知的「三火黃銅」比例有所不同。

賴惠敏支持 Rose Kerr 的觀點，認為中國在 17 世紀才開始發現並使用金

53 馬越、李秀輝著，〈中國古代黃銅製品與冶煉技術的研究狀況分析〉，《中國科技史雜誌》，第 31 卷第 2 期（2010 年），頁 208。

54 Rose Kerr, "Vessel Forms: Censers, Jue and vases," in *Later Chinese Bronze*, pp. 36-37.

55 李米佳，〈宣德爐研究——故宮藏宣銅器的整理與研究〉，頁 18-41。

屬鋅。他進一步研究清代造辦處的史料，發現當時製作銅器的主流材料是黃銅，而非青銅。乾隆年間黃銅的使用量顯著增加，主要用於鑄造北京的銅佛，這些民間招募來的外僱鑄銅工匠，主要來自山西。此外，從清宮記載如鄂爾泰奏摺得知，乾隆年間，北京的銅鋪多達 400 餘家，其中設有熔爐者高達 364 家，反映出清代鑄銅工業的高度發展。<sup>56</sup>

若進一步比對清代黃銅器的成分，如錢幣，則可見工匠對合金比例已有相當的掌握。例如，順治年間的錢幣每枚重一錢，其中紅銅占七成，白鉛占三成；乾隆時期的紅銅比例降至六成，而白鉛提高至四成。此外，《中國古代當鋪鑑定秘籍》記載，不同黃銅製品的銅鋅比例亦各有不同，如銅鏡為 40% 銅、60% 鋅，銅盆為 50% 銅、50% 鋅，而鑼響器則由 70% 銅與 30% 鋅製成。這些數據進一步證明清代工匠已能憑藉經驗調配合金成分，以符合不同用途的需求。<sup>57</sup>

透過上述研究可知，明代才是黃銅器正式的發展階段，主要是用以鑄幣或製成宣德爐一類的銅供器。但黃銅器中的鋅成分含量多寡是否能直接對應年代，目前資料樣本數太少，很難直接下結論。基本上清代的黃銅器不論是錢幣或宣德爐，成分已可達 30% 以上。這與李米佳研究指出北京故宮傳世宣德爐，康、雍、乾到嘉慶朝的 6%~18% 比例，差異甚大。

#### (一) 清代落款宣德爐成分

回到臺灣傳世宣德爐的成份。筆者曾對幾件有落款或年代確認的宣德爐，透過手持式 X-ray fluorescence (簡稱 XRF) 進行檢測，<sup>58</sup> 以下是檢測結果與分析。

56 賴惠敏，〈清宮的黃銅〉，頁 271-275。

57 賴惠敏，〈清宮的黃銅〉，頁 255。

58 本研究採用 Thermo NITON XL3t 950 XRF 手持式材質分析儀，樣品鑑定和鑑別材料可靠性鑑別材料可靠性，包括鎂 (Mg) 到 U (鈾)，達 30 種元素 (因應用而異)，檢測為合金模式 (Alloy Modes)：一般金屬、電子金屬、貴重金屬。

臺南德化堂兩件宣爐，第一件蚰龍耳爐（圖 41）主要成分為銅 67%、鋅 24%、錫 2.8%；第二件夔龍耳爐（圖 42）成分是銅 69-70%、鋅 25~26%、錫 1.3%、鐵 1.1-1.2%。換言之，這兩件宣爐屬黃銅，兩件鋅含量比相當接近，大約佔全器 4 分之 1；銅則大約是接近 7 成左右。這兩件宣德爐由於曾記載於咸豐 6 年物賬中，反映 19 世紀中葉，臺灣傳世宣銅爐中的鋅含量約 25% 左右的案例。<sup>59</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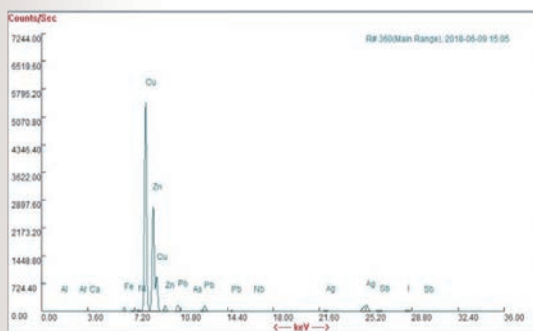


圖 41 臺南德化堂蚰龍耳宣德爐口緣金屬成分分析

資料來源：吳慶泰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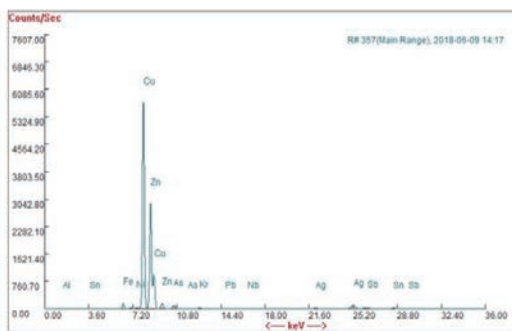


圖 42 臺南德化堂夔耳宣德爐口緣金屬成分分析

資料來源：吳慶泰提供。

另外，另一件位於臺南大天后宮鼎式爐（圖 43），高 66.5、寬 54.5 深 42 公分，此爐外型與臺南孔廟兩件銅爐完全一樣。透過鼎側方框「乾隆四十一年臺灣知府蔣元樞捐造 貢生蔣得皋監製」字樣，得知是乾隆 41 年（1776）蔣元樞提供給孔廟與大天后宮原來作為釋奠禮器使用的鼎爐。此爐與一般常見圓腹型態的宣銅爐系統不同，而《宣德彝器圖譜》卷四〈仿古周文王鼎圖〉（圖 44）也將這類方鼎收納於宣德爐系譜供器中。不過，嚴格來說，這類接近高古銅器樣式的四足方鼎爐，器底無「大明宣德年製」款，不能歸入一般民間或收藏界常見的宣德爐供爐系統。

59 李建緯，〈澎湖馬公傳世金屬香爐研究〉，頁 26。



圖 43 臺南大天后宮乾隆 41 年款蔣元樞捐造鼎式爐與檢測點

資料來源：筆者拍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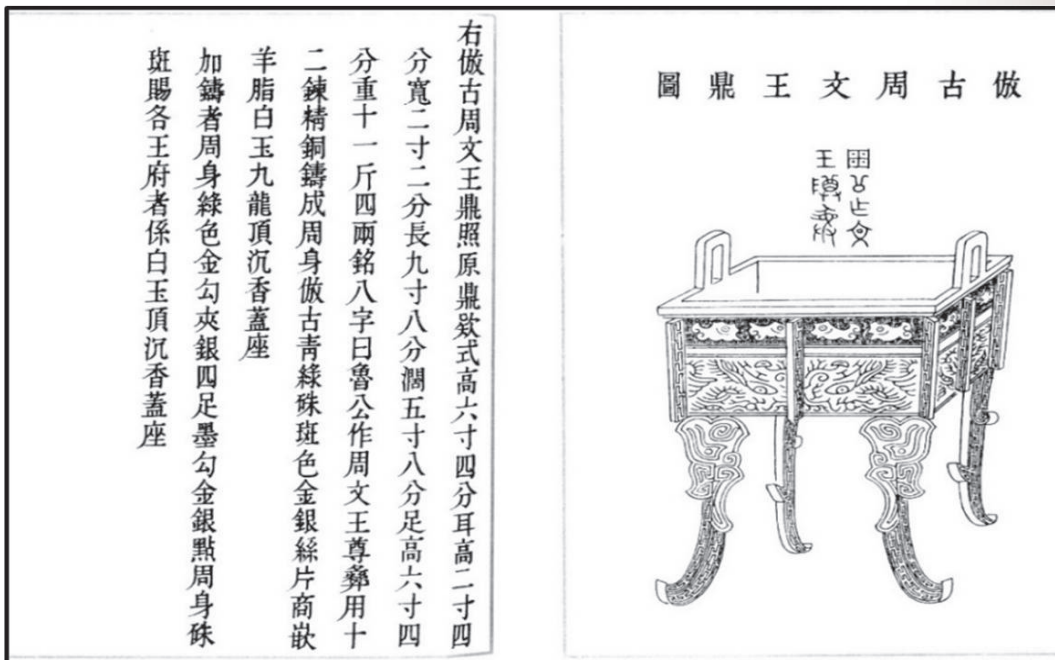


圖 44 呂震，《宣德彝器圖譜》卷四〈仿古周文王鼎圖〉

資料來源：《宣德彝器圖譜》，頁 46-47。

以手持式 XRF 非繞射式螢光分析儀，採常見金屬模式，檢測結果如下：<sup>60</sup>

- ▶測點 1 爐身：Cu 銅 63.57%、Zn 鋅 27.88%、Pb 鉛 2.11%、Sn 錫 1.91%、Si 矽 1.6%、Fe 鐵 1.51%。
- ▶測點 2 黑色補填物：Al 鋁 97.67%、Fe 鐵 1.15%。
- ▶測點 3 爐耳：Cu 銅 50.3%、Zn 鋅 28.94%、Pb 鉛 12.02%、Sn 錫 4.43%、Fe 鐵 2.24%。
- ▶測點 4 爐足：Cu 銅 42.85%、Zn 鋅 25.2%、Pb 鉛 23.76%、Sn 錫 3.19%、Fe 鐵 2.1%、W 鎢 1.29%。
- ▶測點 5 爐足與鑪身焊接點：Cu 銅 44.85%、Zn 鋅 30.18%、Pb 鉛 15.13%、Sn 錫 4.79%、Fe 鐵 2.29%。
- ▶測點 6 爐身：Cu 銅 55.06%、Zn 鋅 29.72%、Fe 鐵 2.16%、Sn 錫 3.03%、Pb 鉛 8.37%。

從成分來看，此爐屬黃銅器。由於它與商周方鼎外觀相近，過去筆者曾誤以為是青銅器。<sup>61</sup> 爐身、爐耳與爐足銅鋅成分差異大，顯示先分鑄後，再以鑄接方式結合。此爐曾破損，後來以鋁填補破孔，應是 20 世紀以後所為。另有微量元素鐵、錫等。單就爐身來看，含銅量 63.57%~55.06% 不等；鋅含量則有 27.88%~29.72%；爐耳銅為 50.3%、爐足的銅僅 42.85%、爐足與鑪身焊接處 44.85%，鋅含量則從 25.2%、28.94%、到 30.18%。由於這類大型黃銅器有許多成形上需要注意的鑄造細節如獸面或雲雷紋等，因此成分中鉛含量高，是一種增加鑄造流動性的作法。從數據可以發現，大型黃銅器中的銅成分不固定，但鋅比例則比較一致。

60 關於金屬成分分析，係 2020 年 10 月 17 日由逢甲大學文化資產與文物保存研究中心陳遵旭專案研究員，以金屬模式施測。

61 黃翠梅、李建緯，《俎豆千古 禮陶樂淑：臺南孔廟釋奠禮與禮樂文物》（臺南：國立臺南藝術大學藝術史學系，2011 年）。

另針對北港朝天宮「咸豐甲寅年」（咸豐 4 年，1854）宣德爐、以及咸豐丁巳年（咸豐 7 年，1857）的萬年香火爐進行檢測，各部位數據如表 2 所示。<sup>62</sup> 從表 2 來看，北港朝天宮咸豐 4 年款銅爐，本體主要成分為銅 61.56~62.44%、鋅則在 33.63~34.31% 之間、鉛則在 1.39~3.1% 之間，另有一些微量成分如鎳、矽、鈦、鋁等，並非刻意混入，顯示鑄造時金屬成分有刻意控制，相當一致，代表該件銅爐係採失蠟法一體成形。至於爐底成分，則與宣爐本體略有差異。

表 2 北港朝天宮咸豐甲寅年款（1854）宣德爐成分分析

爐身		爐耳		口緣		爐底		爐座（獨立件）	
成份	比例	成份	比例	成份	比例	成份	比例	成份	比例
Cu 銅	61.56	Cu 銅	62.1	Cu 銅	62.13	Cu 銅	62.44	Cu 銅	61.72
Zn 鋅	34.2	Zn 鋅	33.89	Zn 鋅	33.63	Zn 鋅	34.31	Zn 鋅	27.86
Pb 鉛	3.1	Pb 鉛	3.05	Pb 鉛	1.39	Pb 鉛	2.6	Pb 鉛	4.84
Si 矽	0.483	Si 矽	0.356	S 硫	0.97	Si 矽	0.229	Fe 鐵	0.935
Fe 鐵	0.191	Fe 鐵	0.212	Fe 鐵	0.194	Fe 鐵	0.19	Ni 鎳	0.13
Ti 鈦	0.014	Ni 鎳	0.061	Si 矽	1.12			Sn 錫	1.28
Ni 鎳	0.073	Al 鋁	0.205					Sb 銻	0.16
								Si 矽	2.28

表 3 顯示，朝天宮咸豐 7 年款萬年香火爐，爐身主要成分為銅 68.98%、矽 10.49%、鉛 7.17%、錫 7.04%；圈足與爐耳成分相近，銅 73.77%~74.65% 之間；錫 7.7%~8.38%；鉛 5.98%~7.05% 之間，未見鋅。從上述主要成分來看，萬年香火爐屬含鉛量高的青銅爐，與一般宣德爐認知的黃銅器不同。再從爐耳、圈足成分比與本體有差異現象，顯示爐耳與圈足係採分鑄法，其後再與

62 檢測時間：2020 年 4 月 24 日，檢測模式：常見金屬，數據：金屬成分百分比，檢測人員陳遵旭。廠牌：Thermo NITON 型號：XL3t 950。

爐身本體鑄接合體。另有微量元素如磷、鈦、銻、鋅等，大約是鑄造時混入坩鍋的微量元素。

表 3 北港朝天宮咸豐丁巳年（1857）萬年香火爐成分分析

爐身		爐耳		圈足	
成份	比例	成份	比例	成份	比例
Cu 銅	68.98	Cu 銅	73.77	Cu 銅	74.65
Si 矽	10.49	Sn 錫	7.7	Sn 錫	8.38
Pb 鉛	7.17	Si 矽	7.07	Pb 鉛	7.05
Sn 錫	7.04	Pb 鉛	5.98	Fe 鐵	0.574
Al 鋁	3.3	Al 鋁	3.51	P 磷	0.301
Fe 鐵	1.4	P 磷	0.272	Zn 鋅	0.442
P 磷	0.502	Fe 鐵	0.52	Sb 銻	0.43
Ti 鈦	0.204	Zn 鋅	0.359	Ti 鈦	0.162
Sb 銻	0.352	Sb 銻	0.41		
Zn 鋅	0.346	Ti 鈦	0.214		

此外，彰化市彰山宮獅首耳爐，爐底「大明宣德年製」六字楷書款（圖 45）。由於臺灣日治時代以後的獅首耳爐多屬薄胎，而此爐採失蠟法之厚胎工藝，又廟方指出此爐為乾隆年間建廟之初便已供奉，或可視為具清代的特點。檢視其工藝，推測爐耳與爐身應是在一塊蠟模上一體成形，非分鑄後接合，故分別對爐身及爐耳施測，觀察兩者成分是否接近。<sup>63</sup> 檢測爐身（圖 46）成分為銅 67.47%、鋅 28.07%、鉛 1.03%、鐵 1.06%；檢測爐耳（圖 47）成分為銅 62.86%、鋅 26.02%、鉛 1.3%、鐵 0.57%。從上述成分來看，該爐屬於銅七鋅三之比例。

63 檢測採 GM (General Metals) 常見金屬模式，由於檢測時無平坦表面，有些微漏光，故成分比例數據僅供參考，非準確數值。由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吳慶泰助理研究員等執行檢測，日期為 2023 年 7 月 20 日。



圖 45 彰化市彰山宮獅首耳爐，爐底「大明宣德年製」，銅約 67%、鋅約 28%

資料來源：筆者拍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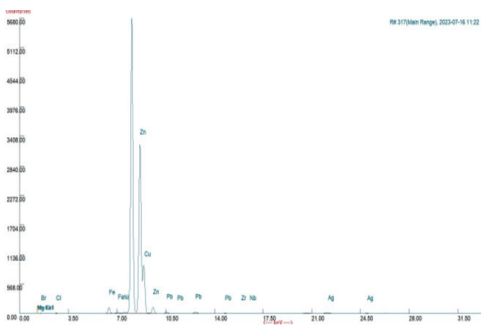


圖 46 彰化彰山宮獅首耳爐，爐身檢測圖譜

資料來源：吳慶泰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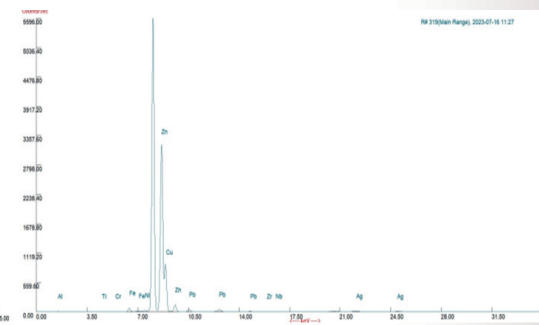


圖 47 彰化市彰山宮獅首耳爐，爐耳檢測圖譜

資料來源：吳慶泰提供。

## (二) 日治時代落款宣德爐成分

屏東大樹房觀林寺民國 2 年款（1912）的沖耳爐（圖 48），經檢測足部與底部銅約 61.38~62.03%、鋅 33.13~33.50%、錫約 1.13-1.17%、鉛 2.56-3.5%、鐵 0.58-0.59%。<sup>64</sup> 上述資料顯示，這件民國初年宣德爐成分約銅 6 鋅 3，其餘是微量金屬元素。

64 盧泰康、李建緯，《文物觀自在：恆春大光里觀林寺文物調查研究》，頁 85-8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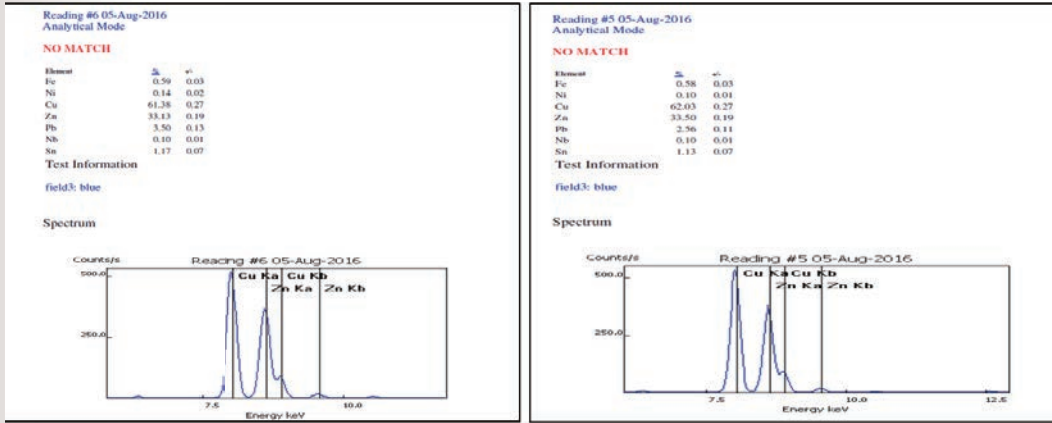


圖 48 屏東大樹房觀林寺民國 2 年款沖耳爐金屬成分，左為足部，右為底部。銅約 61-62%、鋅約 33%

資料來源：盧泰康、李建緯，《文物觀自在：恆春大光里觀林寺文物調查研究》。

至於日治時代臺灣的宣德爐成分，以馬公發現大正年款的銅宣爐案例，也都是黃銅：東甲北極殿藍木製作大正年款壓經爐銅 83%、鋅 10%（圖 23）；約同時期馬公五德威靈宮大正壬戌年（大正 11 年，1922）蚰龍耳爐，經檢測成分得知銅濃度約 60%、鋅濃度約 29%，屬黃銅（銅鋅合金）。銅器文物加工過程會添加微量鉛（Pb），本次檢測文物內含有約 5%，原因為此，也含有微量元素如鋁（Al）、鐵（Fe）、錫（Zn）等。<sup>65</sup>從上述資料來看，日治時代五德威靈宮的蚰龍耳爐鋅有 29%；而澎湖馬公藍木製作北極殿大正年款壓經爐鋅僅 10%，反映百年前的藍木鑄造時，可能未充分掌握中國宣銅比例，也不排除澎湖當時取得單質金屬鋅較為困難。<sup>66</sup>

同樣的大正壬戌年款的嘉義市新厝仔炳靈宮蚰龍耳爐，經檢測底部元素有銅 65.45%、31.81%、以及微量鉛 1.88%、鐵、矽、錫及銻（圖 49）；口緣主要元素含銅 64.23%、鋅 31.89%、微量鉛 2.40%、以及不到 1% 的矽、鐵、錫及銻（圖 50）。<sup>67</sup>綜合檢測結果顯示該件宣德爐材質為銅鋅合金，比例四

65 2017 年 7 月 31 日由南藝大邵慶旺等實施檢測。李建緯，〈澎湖馬公傳世金屬香爐研究〉，頁 14。

66 李建緯，〈澎湖馬公傳世金屬香爐研究〉，頁 28。

67 2025 年 2 月 14 日，由科工館吳慶泰助理研究員、李宇妍實施檢測。

捨五入後約為銅七鎳三，底部與口緣成分相近。其中微量元素則是為鑄造時的添加物。儀器檢測數據與內建資料庫中 C332PbBs 型號匹配，而 C332 屬工業標準金屬型號。<sup>68</sup> 這顯示日治時代少部分宣爐鑄造，可能已採標準金屬配方製作。


檢測編號	333	檢測位置	宣德爐爐底
	分析模式	一般金屬 (General Metals)	
	單位	重量百分比 (%)	
	元素	一般金屬	
	銅 (Cu)	65.45	
	鎳 (Zn)	31.81	
	鉛 (Pb)	1.88	
	鐵 (Fe)	0.42	
	矽 (Si)	0.22	
	錫 (Sn)	0.07	
	銻 (Sb)	0.03	
備註：不同模式下，各元素濃度總值非 100%			

圖 49 嘉義市新厝仔炳靈宮蚰龍耳爐，爐底 XRF 測點分析

檢測編號	344	檢測位置	宣德爐口緣
	分析模式	一般金屬 (General Metals)	
	單位	重量百分比 (%)	
	元素	一般金屬	
	銅 (Cu)	64.23	
	鎳 (Zn)	31.89	
	鉛 (Pb)	2.40	
	矽 (Si)	0.68	
	鐵 (Fe)	0.39	
	錫 (Sn)	0.07	
銻 (Sb)	0.03		
檢測點為爐口緣，影像標示為相對位置		備註：不同模式下，各元素濃度總值非 100%	

圖 50 嘉義市新厝仔炳靈宮蚰龍耳爐，口緣 XRF 測點分析

68 “C33200”. 收錄於「Copper Development Association Inc」：<https://alloys.copper.org/alloy/C33200> (2025/2/25 點閱).

而嘉義震安宮昭和年款宣德爐，進行爐底測點分析（圖 51）。以常見金屬（General Metals）模式檢測，主要金屬成份有銅（Cu）70.98%、鋅（Zn）19.7%、鉛（Pb）0.76%、鐵（Fe）0.43%。<sup>69</sup> 透過上述案例來說，大致上日治時代的銅成分，從銅濃度從 83%~60% 不等；鋅濃度從 33.50%~19.7%。年代上無法反映特定的金屬成分比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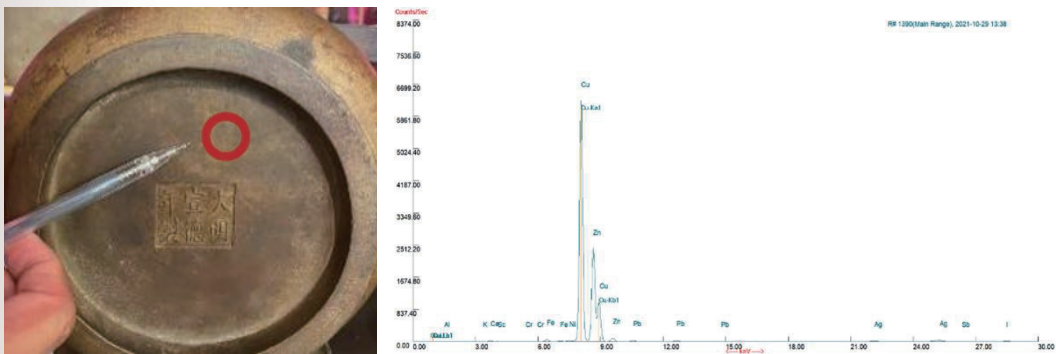


圖 51 嘉義震安宮昭和年款宣德爐，爐底 XRF 測點分析

民國時期以後，檢測前寮朱王廟 1961 年款獅首耳爐，爐身未燻黑處，發現元素濃度為銅元素 61.3%、鋅元素 32.8%、與其他鉛、錫等元素。<sup>70</sup> 銅、鋅含量基本上與日治時代臺灣宣德爐成分沒有太大差異。

透過上述案例來看，相較於維多利亞博物館宣德爐中鋅含量在 28~35%，<sup>71</sup> 而李米佳檢測北京故宮不同時期宣德爐鋅成份比例是越來越高，但鋅含量基本都在 18% 以下；反觀臺灣傳世宣德爐鋅含量卻從 0%~37% 間，時間上也看不出明顯的增加或減少之趨勢；銅含量高低比也看不出明顯趨勢（圖 52）。從實際鑄造的需求來看，銅鋅含量成分差異高低不同，顯示受到作坊金屬取得方式的影響更大。

69 李建緯主持，林仁政、林韻柔協同，《110-111 年嘉義市東區廟宇第二階段調查研究計畫成果報告書（上冊）》（嘉義：嘉義市政府文化局委託，逢甲大學文化資產與文物保存研究中心執行，2022 年），頁 395-399。

70 2017 年 8 月 19 日由南藝大邵慶旺教授等實施檢測。

71 Rose Kerr, "Vessel Forms: Censers, Jue and vases," pp. 36-3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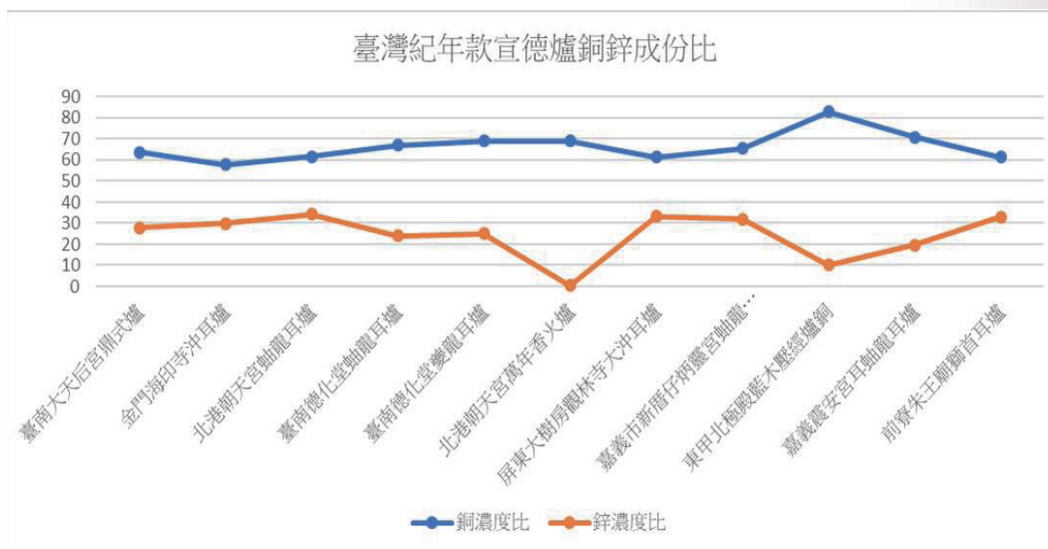


圖 52 臺灣紀年款宣德爐銅鋅成份比

資料來源：本研究製圖。

上述的 XRF 分析，雖提供科學證據，但由於落款銅宣爐樣本數量有限，若能擴大分析範圍，將更具代表性。進一步思考，透過檢測獲得的臺灣紀年款宣德爐成分比，銅鋅比例差異之大，除了是年代上的變數，更應考慮到不同地區、不同作坊的問題。清代以後金屬鋅來源雖然穩定後，多數宣爐鋅含量約在 25% 以上，但偶也發現未含鋅，如萬年香火爐、或鋅含量極低者。整體來說，清代、日治時代和戰後中華民國政府遷臺以後銅鋅合金比例，時代上的差異變化並不明顯。由此可知，要解決鋅含量與年代對應關係，必須有更多樣本來說明。

#### 肆、臺灣宣德爐實際年代與文化意涵

透過前文田野資料可知，臺灣附紀年款宣德爐未早於 19 世紀，更不用說是宣德年間。這種器類在臺灣可被證明的流行年代，從 19 世紀中葉到 20

世紀下半葉的 1970 年代。從中國器物發展的脈絡可知，「款識」本身並不等於年代，它常是某種「成規」（convention）的「再現」（representation）。而臺灣傳世宣德爐的器底「鑄款」（Cast Inscription），可說是這類香爐的 DNA，宣示了其物體系譜原生血統，遙追明清以降宣德爐的集體歷史記憶。

明清時期文人「四般閒事」，即焚香、點茶、掛畫、插花，在几案上焚香清供，用的便是這種線條俐落、形態優美的宣爐。不論是或作為宗廟祭祀熏香或做為書房焚香用，爐尺寸不大，適合擺在室內。項子京在明天啓丙寅年間成書的《宣爐博論》中，品評宣德爐，而有如此一說：「乳爐、魚耳、蚰耳，以此三種皆宣廟文房之所御用也，款式典雅，樸素無文，置之几案，何妙如之。」<sup>72</sup> 前文顯示以宣德爐為載體的焚香，至明末甚至被認為是文人「四般閒事」中典雅卻妙不可言的閒玩之首。

宣德爐在明晚期被高度重視，也因《宣德鼎彝譜》被收錄在清初的文淵閣《四庫全書》，將這種器類出現年代橫空出世地定錨在 15 世紀，爾後圍繞其論述更讓宣德爐被「神話化」，如文章開頭所引柯恩《歷史三調》，宣德爐的論述不斷重複宣德 3 年（1428）暹羅國進貢風磨銅、而且成分含金銀、提煉如煉丹困難的「神話」（Myth）上。

從文化層面來說，這些宣德爐正契合布希亞（Jean Baudrillard，1929-2007）所說「神話學」一類之古物，功能性不大卻意義滿盈，喚起先前王朝（宣德朝）符號，又在明末到清朝代代相傳、被點名具稀有性與尊貴性，補償了它們作為純實用物品功能的缺席，朝向藝術化、觀賞化。當然，宣德爐一直以來都具乘載焚香之功能，但它在其社會功能的光譜上，從明代晚期、清代以至於民國時期逐漸朝向收藏的一端靠攏。此等追逐宣爐現象，貫穿整

72 項子京，〈宣爐博論〉，收錄於「維基百科·諸子百家·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畫」：<https://ctext.org/wiki.pl?if=gb&chapter=112853>（2023/10/16 點閱）。

個清代，在收藏高檔珍玩中不曾缺席。在清順治3年（1646）一份財產清查資料提到：

張國維共廳房大小莊屋貳百肆拾肆間，據子張世鵬供出有珠冠貳箇，首飾共貳百兩，金壹百兩，珠花貳拾枝，玉盃參對，犀盃拾箇，金盃壹對，銀盃拾箇，銀伍千伍百兩，酒器參拾副，奇楠帶壹條，花銀帶壹條，玉帶壹圍，金帶壹條，紬衣拾件，紗衣拾伍件，犀帶壹圍，錫器參拾□，□佛肆箇，花梨床壹張，宣爐參箇，水晶佛壹箇。<sup>73</sup>

若只作焚香用，宣爐不需用到三件；此外，文獻紀錄中的宣爐，是被放在奇楠帶、花銀帶、玉帶、金帶、犀帶、錫器、花梨床與水晶佛等「珍玩」分類系統，一同被提及的。

另一項記載來到乾隆46年（1781），清閩浙總督陳輝祖（？-1783）奉乾隆命令查抄甘肅冒賑案事主王亶望的家產，但陳輝祖起貪念，以四、五萬兩白銀盜換價值九萬餘兩黃金，偷了王家玉器，並將貴重器物多占為己有，其中還包括王亶望收藏的銅宣爐3個，也被他調換。紀錄如下：

問：現據委員們供，你尚有調換的銅宣爐三個、新羅山人牡丹一軸、唐寅麻姑圖一件，又在何處。

據供：銅宣爐三個，我實在未經調換，我調換玉器貴重物件，均已供認。若銅宣爐果係我調換，又何必抵賴。…<sup>74</sup>

然而其他人卻招認，銅宣爐確實已被掉包。乾隆47年（1782）武英殿

73 浙江福建張存仁（等），〈啟為報明查勘逆產事〉，收錄於「臺灣歷史數位圖書館」：<https://thdl.ntu.edu.tw/THDL/RetrieveDocs.php>（2025/5/9 點閱）。

74 武英殿大學士阿桂（等），〈陳輝祖供單〉，收錄於「臺灣歷史數位圖書館」：<https://thdl.ntu.edu.tw/THDL/RetrieveDocs.php>（2025/5/9 點閱）。

大學士阿桂（等）的一份紀錄〈抽換玉器古玩供單〉說明如下。<sup>75</sup>

劉大呂供：…銅宣爐三件都不是原物…；朱桐供：…銅宣爐三件、自鳴鐘二架，都不是原物…；王士澣供：…銅宣爐三個俱不像原物，我們亦不敢提起，…；楊仁譽供：十月、十一月間陳總督又提驗過物件三次，內玉瓶一隻、玉提梁壺一件、玉碗一件、玉磬一件、玉太平有象一件、玉煖手五件一匣、銅宣爐三件，發還時俱不像原物，…。

陳輝祖因將抄家沒收的珍貴文物占為己有，於是乾隆 48 年（1783）2 月被乾隆賜死。就上述語境來看，可發現宣德爐和其它玉器、自鳴鐘、金銀杯、金銀帶、奇楠等珍奇異寶，一同出現。

我們從 16 世紀晚期到 18 世紀初與宣爐品鑑有關文獻論述中，便可見到擁有一件宣德爐，便如同社會地位的表徵，非以庸俗量化的金錢價值可購買的。明中後期形成骨董收藏風氣的各類古玩中，<sup>76</sup>「宣德真爐」的標籤，更因來自皇家、屬於御用、首批限量（三千餘件），因此最具尊貴地位，這也是後世收藏界或文物研究，對於確認「宣德三年」銅爐的身分歸屬，有著近乎癡迷的原因。

另一方面，這種「宣德爐」在整個生產到收藏的社會系統的概念中，形成了一種大的「語言結構」（langue），而個別進入到地方社會或地區的銅爐，便是個別的「言說」（parole）。俯瞰臺灣傳世宣德爐使用現象與年代脈絡，這類源自中國傳統的銅爐，進入臺灣地方社會後，產生幾點特殊的文化現象。

75 武英殿大學士阿桂（等），〈抽換玉器古玩供單〉，收錄於「臺灣歷史數位圖書館」：<https://thdl.ntu.edu.tw/THDL/RetrieveDocs.php>（2025/5/9 點閱）。

76 姚暘，〈明代江南民間藝術收藏中的贗品探析〉，頁 72-83。

其一、宣德爐使用對象的庶民化。

明清以後的宣德爐由於成為收藏的競逐對象，贗品或仿製品大量出現，因此逐漸被商品化。這種商品化後的宣德爐，自然也流入臺灣早期社會。和明清以降小型銅爐作為文玩收藏脈絡不同的是，臺灣寺廟中的宣爐目的不是作為被獨享、或被其他人欣羨對象，而回到爐的原始功能，作為耐熱燃香之器來使用。特別是臺灣宣爐，十之八九是信徒捐獻給神明，除了器底款識，器表鑿刻款（Engraved Donor's Inscription）更將這種宣德爐年代神話，從宣德朝迷霧中拉回現實，如同將個別宣德爐製造的事件（引用柯恩在《歷史三調》的說法），錨定在具體的時代與地點。

這類在清代中後期以降，寺廟、佛堂、祠堂等場所做為宗教儀式供器的銅宣爐，與臺灣庶民生活糾纏一起。因此，沒有被使用者企圖靠攏向宣德真爐的壓力。器底訂製的款識和器表鑿刻款的差別，在於以鑄造為主的款識（Molded Inscription）必須預先設計字型與內容，其製作如青花瓷爐中的釉下字體的窯前燒；但鑿刻款卻可以在同一種款識「大明宣德年製」識款下，批量生產商品，銅爐離開產地進入各地消費者手中，可再透過二次加工的鑿刻來宣示他的姓名與時間點。因此，以金屬鑿刀刻劃的紀年款，如同一種被銘刻在銅爐身體的刺青，更是個別信徒獻給神明「禮物」的一種宣示。19世紀臺灣寺廟大量出現這種被庶民化、在村里間獻給神明的日用宣爐，也代表它們從宮廷樓閣，走入鄉里村廟中。

再從使用情境來看，明清收藏功能為主的宣德爐，輾轉流浪於不同的擁有者手上，對銅爐來說，這些曾擁有過它們的主人，都是宣德爐生命史中的過客；但鑿刻款的銅宣爐，在器上中央刻銘著廟名或神明名稱，則被錨定在地方社會，其主人既非文人、亦非收藏家，而是地方中屬於特定社群、位於祭祀空間、奉獻給特定祭祀對象。而民間這樣的銅爐，往往存在於地方寺廟、

祠堂、會館或宅第中，長達百年以上，其主人是空間中被祭祀的神明或祖先。

其二、宣德爐進入地方社會後的在地化。

先說臺澎金馬傳世宣德爐，其整體造形上與明清常見宣德爐並無太大的差異，流行類型也多屬蚰龍耳爐、沖耳爐、壓經耳爐、獅首耳爐等藏家或博物館常見的種類。但因屬特定祭祀空間用的供器，一些款識被客製化，如大正年款澎湖東甲北極殿壓經耳爐等；另一種則在商品化的宣爐基底上，鑿刻上寺廟（或祭祀主神）名稱，並於爐身左右兩側鑿刻上下款，如同木香爐或石香爐等宗教文物一般，基本上仍維持原來薰香的功能。甚至某些地方的宣德爐，連身分標誌的器底款識，也跟著被省略，如北港朝天宮萬年香火爐、中寮代天宮的壓經耳宣德爐，顯示這類銅爐被選用製作，重點是能不能發揮功能，而非「大明宣德年製」這幾個字。

若我們將臺灣民間信仰中各類香爐與符號系統連結，一進廟門前擺放最巨大的天公爐，當信徒手持線香向天公禮拜秉告，如同表明信徒在此，將個人身心座標安於眼前此座寺廟，是自我「在場」的宣示；至於寺廟內以不同神明為對象的線香爐，則可說是神明靈力來源（飯碗），這類香爐形同信徒和神對話，祈求願望能上達天聽的一種鏈結方式；而本文所討論的宣德爐，則以熏爐的功能現身，使用者並非一般信徒，而是廟內執事人員，點上沉香，便能切換寺廟氣氛，如同召喚神明降靈來到此地。由此出發，我們可發現臺灣寺廟的宣德爐，並非以「收藏」的語境現身，而是回應熏爐本身招喚神靈改變氣氛的原始功能為考量。

宣德爐另一種在地化獨特化的表現，則以粵東為首，該地銅爐朝向體積巨大化、種類單一化（獅首耳爐）、專業模組化（廣州與佛山生產）發展。明清原來的獅首耳爐造形含蓄，獅鬃毛細膩且比例合宜。但粵東銅爐則朝向巨大容積的腹部、誇張外凸的獅頭，高高矗立的圈足，整體形態甚具展示性，

功能上也轉為作為插線香的神明香爐。這類粵東獅首耳爐，很快地擴散到海外華人的活動範圍，如檳城、馬六甲、新加坡、泰國曼谷、印尼、越南等地。<sup>77</sup>這反映了以閩南文化為主的臺灣地方上的宣德銅爐，不論是薰香方式或形態，衍生出的形態，並未如粵系銅爐的形象如此鮮明。

其三、宣德爐從「宣德三年」真爐神話解放，在臺灣卻被包裝成「歷史神話」。

如前開指出，眼下對宣德爐的認識多半建立在《宣德鼎彝譜》文獻上，而它們被認為是塑造宣德爐收藏指南的撰述。反觀臺灣傳世的宣德爐使用的目的上，受前述宣德3年泰國入貢風磨銅的神話影響不大。不過，近年不少寺廟對早期遺留下來的宣德爐，反而拿來宣傳並證明建廟追溯明鄭或明代以前之證據。這也是另一種被「神話化」論述，雖擺脫「宣德年製」的標籤，卻再次被「符號化」，重新被賦予另一套歷史神話。例如：「在床底下意外發現一個沉甸甸包裹，找出這批明朝所造的古物，包括底部刻有『大明洪武六年仲春工部尚書董直鑑鑄』的鑄銅淨爐、『大明宣德年製』銅香爐…足證明『某某寺廟』真是歷史久遠」的說法。

根據羅蘭·巴特的神話學理論，寺廟宣傳擁有古老文物來證明寺廟的悠久歷史，可以被解讀為一種宣德爐被「再符號化」的當代神話創造過程。<sup>78</sup>古老宣德爐文物不僅是歷史證據，更被賦予額外的衍生意義和價值，包裝為一種文化符號。這些文物作為一種歷史中的神話化，成為連接過去與現在、凡人與神聖的橋樑。通過強調擁有古文物，寺廟不僅在陳述自己的歷史，也塑造一種威望和神聖性，這種威望和神聖性是建立在歷史深度和文化連續性的基礎上。以巴特說法，神話是一種溝通形式，它將文化的歷史和意識形態轉化為一種看似自然且不可質疑的狀態。因此，當寺廟使用古老文物特別是

77 李建緯，〈馬來西亞檳城傳世銅爐形制與產地研究〉，《臺灣東南亞學刊》，第19卷第1期（2024年4月），頁27-99。

78 Roland Barthes（羅蘭·巴特）著，許薔薔、許綺玲譯，《神話學》，頁viii。

有款識的宣德爐來宣傳時，實際上是在運用這些物品的符號意義，傳達一種信息——即此座寺廟既是文化傳統的守護者和傳承者，也是該信仰在臺灣的創始者。

羅蘭·巴特更指出，神話若可發生作用，是因它們符合社會大眾的期望：「人不關心神話是真是假，而是關心它有用無用：人依其需要進行去政治化」<sup>79</sup>；「神話中的記號掛滿了不必要的綴飾，而且宣稱自己符合自然」。<sup>80</sup>由此出發，我們發現，宣爐真正年代或歷史脈絡為何，並不重要，反而是它能否作為一種與「祖先」、「歷史」、「開臺」等神話連結的證據，更被關切。<sup>81</sup>

流行於清代中葉到民國時期臺灣傳世宣德爐，當然沒有五百多年前的宣德銅爐。本研究透過田野實證，戳破臺灣寺廟並無宣德年間的宣德爐之神話，更遑論要用這些銅爐來反證建廟有五百多年歷史的「再神話化」。鑿刻紀年款，提供宣德爐年代判斷上比「款識」更具實證的依據。當代寺廟透過宣德爐宣傳建廟久遠的手法，除了希望能增強寺廟在社會中的開創地位，也加深了人們對於寺廟作為文化和宗教中心的認同。它們通過這種方式，將自己定位為一個連接過去與未來、俗世與神聖的重要場所。這種神話化的策略，常是當代寺廟用以維繫其文化影響力和吸引信徒的一種手段。

## 伍、結論

本研究指出，要破解宣德爐之謎，不能受囿於文獻，因為過去層層疊加的文獻，雖提供後世大量的宣德爐收藏與鑑識訊息，但同時卻產生迷霧，掩

79 Roland Barthes (羅蘭·巴特) 著，許薔薔、許綺玲譯，《神話學》，頁 viii。

80 Roland Barthes (羅蘭·巴特) 著，許薔薔、許綺玲譯，《神話學》，頁 ix。

81 李建緯，〈臺灣寺廟現存「宣德爐」形制、年代與功能〉，頁 217。

蓋了真相。同時，過去對傳世宣德爐的年代判讀，也仰賴風格與器底款識，欠缺客觀證據。本文則透過紀年款與科學分析，實際面對田野中流傳有序的實物，方不會被一再傳誦的宣德爐神話牽著鼻子，而提出更具說服力的年代判讀方法，打破傳統「自由心證」的困境。

同時，現今學界研究提出，或可透過宣德爐成分科學檢測來解決年代問題，實際上本研究對臺灣現存不同年款銅爐施測後，發現銅鋅比例差異與年代對應關係，並不明顯。其間必須考慮到不同地區、不同作坊金屬取得方式的差異。清代中後期當金屬鋅來源穩定後，不論是清代、日治時代和戰後中華民國政府遷臺以後，銅鋅合金比的差異則逐漸不明顯。因此以檢測成分的科學量化方式，需更龐大的樣本來源，方能對這些宣德銅爐的鑄造成分與現象，有更宏觀的認識。

透過本研究的考察，臺灣寺廟中傳世宣德爐主要係信徒捐獻，除了爐底規範的款識，器表上同時還有敬獻者的鑿刻款，而這些附帶鑿刻紀年的宣德爐因是獻給神明，少了年代上的吹噓與浮誇，提供了更真實的年代，不僅能作為認識這批臺灣傳世宣德爐的真正年代範圍，也足以突破臺灣某些寺廟捏造建廟年代久遠的切入點。同時，不少收藏界認為「大明宣德年製」銅爐的明代身分，但本文則實證地指出，許多臺灣流傳的宣德爐實際上是 19~20 世紀的產品，這對市場上的「宣德爐神話」，可以提出再思考的面向。

進一步來說，要真正認識這些進入地方社會的宣德爐的年代與文化意涵，還是應從個案入手，釐清地方開發年代、贊助人、族群與展示方式等地方社會。若單憑宣德爐的造形與成分來解析它，也僅能認識到它的皮相。

## 徵引書目

## 壹、文獻

- 未知作者，〈改過齋雜記〉，收入陳夢雷編，《古今圖書集成》，第 236 卷，  
《考工典》，〈爐部雜錄〉，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清雍正銅活字刊本。
- 呂棠編、清杭世駿撰，《宣德彝器譜》，收入《叢書集成續編》，第 94 冊。  
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88 年。
- 呂震，《宣德鼎彝譜》。北京：中國書店，2006 年。
- 呂震，《宣德彝器圖譜》。北京：中國書店，2006 年。
- 高濂撰，《遵生八箋》，明萬曆 19 年（1591）雅尚齋刊本。
- 項于汴，《宣爐博論》，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840 冊。臺北：  
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 年。
- 陳文達編纂，方豪編輯，《臺灣縣志》。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1  
年。

## 貳、專書或專書論文

- Barthes, Roland (羅蘭·巴特), *Mythologies*, 中文版為許薔薔、許綺玲譯，  
《神話學》。臺北：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7 年。
- Burke, Peter (彼得·柏克), *History and Society Theory*, 中文版為江政寬譯，  
《歷史學與社會理論》。臺北：麥田出版社，2009 年
- Culler, Jonathan (喬納森·卡勒), *Saussure*, 中文版為張景智譯，《索緒爾》。  
臺北：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2 年。
- Cohen Paul A. (保羅·柯思) *History in Three Keys: The Boxers as Event, Experience, and Myth*, N.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8。中文版為杜繼東譯，《歷史三調：作為事件、經歷和神話的義和團》。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 年。

- 王嵩山、李建緯主持，《澎湖縣百年歷史廟宇及教堂文物普查計畫一成果報告》。澎湖：澎湖縣政府，2016年。
- 王嵩山、李建緯主持，《澎湖縣百年歷史廟宇及教堂文物普查計畫二成果報告》。澎湖：澎湖縣政府，2017年。
- 王嵩山主持，《澎湖縣百年歷史廟宇及教堂文物普查計畫三成果報告》。澎湖縣政府委託，逢甲大學亞太博物館與文化研究中心執行，2018年。
- 北京鋼鐵學院《中國古代冶金》編寫組，《中國古代冶金》。北京：文物出版社，1978年。
- 李米佳，《宣德爐研究——故宮藏宣銅器的整理與研究》。北京：科學出版社，2012年。
- 李建緯，〈臺南市大天后宮早期金屬香爐年代與形制源流考〉，收入彭文字主編，《媽祖文化研究論叢I》。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5月，頁202-216。
- 李建緯，《歷史、記憶與展示：臺灣傳世宗教文物研究》。臺中：豐饒文化社，2018年。
- 李建緯主持，林仁政、林韻柔協同，《110-111年嘉義市東區廟宇第二階段調查研究計畫成果報告書》（上冊）。嘉義：嘉義市政府文化局委託，逢甲大學文化資產與文物保存研究中心執行，2022年。
- 李建緯主持，盧泰康、林建育協同，《113-114年金門縣太武山海印寺及後浦靈濟古寺文物調查研究計畫案成果報告書》。金門：金門縣文化局委託、逢甲大學文化資產與文物保存研究中心執行，2025年。
- 李耀明主持，《108-110年金門縣金湖鎮宮廟宗祠文物普查建檔計畫成果報告書》。金門：金門縣文化局委託，宜誠資訊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
- 陳擎光，《故宮歷代香具圖錄》。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94年。

普恩，〈恭記德化堂聖跡〉，收入王見川、王惠琛主編，《臺灣老齋堂的珍寶：臺南德化堂所藏的經卷與文獻·第一冊》。新北：博揚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8 年。

黃翠梅、李建緯，《俎豆千古 禮陶樂淑：臺南孔廟釋奠禮與禮樂文物》。臺南：國立臺南藝術大學藝術史學系，2011 年。

黃翠梅計畫主持人，李建緯、林素幸、黃猷欽協同主持人，《臺南市國定第一級宗教性古蹟內古物普查計畫結案報告》。臺南：臺南市政府文化觀光處委託，國立臺南藝術大學藝術史學系執行，2011 年。

葉俊麟主持，《110-112 年宜蘭縣百年寺廟文物普查計畫一委託案期末報告》。宜蘭：宜蘭縣文化局委託，中原大學執行，2023 年。

劉靜敏，《金玉青煙》。臺北：國立歷史博物館，1996 年。

蔡金鼎主持，《苗栗縣頭份鎮等六鄉鎮古文物普查計畫成果報告書》。苗栗：苗栗縣政府文化觀光局委託，嵐厝創意企業社執行，2015 年。

冀甯道人、郭瑞雲編著，《府城道教廟宇文物集》。臺南：清流出版社，1988 年。

盧泰康、李建緯，《文物觀自在：恆春大光里觀林寺文物調查研究》。屏東：大樹房觀林寺，2021 年。

賴惠敏，《乾隆的百寶箱》。新北：八旗文化出版社，2023 年。

顏尚文等編，《嘉義市志·卷十·宗教禮俗志》。嘉義：嘉義市政府，2005 年。

Kerr Rose, *Later Chinese Bronzes*, London: Victoria & Albert Museum, 1990.

### 參、期刊論文或學位論文

王正華，〈女人、物品與感官慾望：陳洪綏晚期人物畫中江南文化的呈現〉，《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第 10 期（2002 年 12 月），頁 1-57。

- 李建緯，〈馬來西亞檳城傳世銅爐形制與產地研究〉，《臺灣東南亞學刊》，第 19 卷第 1 期（2024 年 4 月），頁 27-99。
- 李建緯，〈澎湖馬公傳世金屬香爐研究〉，《民族學研究資料彙編》，第 27 期（2019 年 12 月），頁 1-40。
- 姚暘，〈明代江南民間藝術收藏中的贗品探析〉，《故宮博物院刊》，第 166 期（2013 年第 2 期），頁 72-83。
- 馬越、李秀輝，〈中國古代黃銅製品與冶煉技術的研究狀況分析〉，《中國科技史雜誌》，第 31 卷第 2 期（2010 年），頁 207-214。
- 張光遠，〈大明宣德爐〉，《故宮文物》，第 32 期（1985 年 11 月），頁 4-16。
- 張光遠，〈鎏金精雕大明宣德爐〉（上），《故宮文物》，第 85 期（1990 年 4 月），頁 62-77。
- 張光遠，〈鎏金精雕大明宣德爐〉（下），《故宮文物》，第 86 期（1990 年 5 月），頁 96-107。
- 張泗福，〈「宣德爐」在臺灣二十世紀供器中的身影〉，臺中：逢甲大學歷史與文物研究所碩士論文，2023 年。
- 陸鵬亮，〈宣爐辨疑〉，《文物》（2008 年第 7 期），頁 64-92。
- 葉仲霖，〈臺南市南區省躬社聖化堂「法會圖軸」調查研究〉，臺南：國立臺南藝術大學藝術史學系藝術史評與古物研究所碩士論文，2024 年。
- 趙中男，〈宣德朝宮廷文化的繁榮及其原因〉，《故宮博物院刊》，第 175 期（2014 年第 5 期），頁 143-157。
- 劉靜敏，〈宣德彝器圖譜之探討〉，《歷史文物》，第 6 卷第 2 期（1996 年 4 月），頁 44-50。
- Pelliot Paul, "Le Prétendu album de Porcelaines de Hiang Yuan-pien," *T'oung Pao*, vol.32 (1936), pp. 15-58。

肆、網路資料

“C33200”，收錄於「Copper Development Association Inc」：<https://alloys.copper.org/alloy/C33200>。

〈北港朝天宮萬年香火爐〉，收錄於「國家文化資產網」：<https://nchdb.boch.gov.tw/assets/overview/antiquity/20180604000002>（2023/10/10 點閱）。

〈啟為報明查勘逆產事〉，〈陳輝祖供單〉，〈抽換玉器古玩供單〉，收錄於「臺灣歷史數位圖書館」：<https://thdl.ntu.edu.tw/THDL/RetrieveDocs.php>（2025/5/9 點閱）

「款識」，收錄於「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https://dict.revised.moe.edu.tw/dictView.jsp?ID=78399&la=0&powerMode=0>（2023/10/17 點閱）。

〈經濟彙編考工典第 236 卷爐部〉，《古今圖書集成》，收錄於「維基文庫」：[https://zh.wikisource.org/zh-hant/Page:Gujin\\_Tushu\\_Jicheng,\\_Volume\\_799\\_\(1700-1725\).djvu/61](https://zh.wikisource.org/zh-hant/Page:Gujin_Tushu_Jicheng,_Volume_799_(1700-1725).djvu/61)（2023 /11/6 點閱）。

未著撰人，〈一件明宣德金胎蓋爐在港拍得 1.168 億港元〉（2008/4/12），收錄於《卓克藝術網》：<http://news.zhuokearts.com/html/20080412/82955.html>（2023/10/10 點閱）。

未著撰人，〈宣德爐收藏在拍賣價格上屢創新高，價格突破千萬元〉（2018/7/24），收錄於《香天下》：<https://www.xiang.com/news/542.shtml>（2023/10/10 點閱）。

宋應星，《天工開物卷下·五金第十四·附倭鉛》，收錄於「維基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畫」：<https://ctext.org/wiki.pl?if=gb&chapter=429139>（2024/6/25 點閱）。

張嘉倫，〈阮思德談宣德爐的身世之謎〉（2020/8），收錄於《典藏 ARTouch》：<https://artouch.com/art-views/art-history/content-13013.html>（2023/10/8 點閱）。

趙志瀚，〈5 分鐘古玩學堂，神龍見首不見尾的都市傳說 - 宣德爐〉（2019/6/11），收錄於《The Value》：<https://hk.thevalue.com/articles/xuande-bronze-censer-koller-auction>（2023/10/8 點閱）。

## **The Chronology, Composition, and Cultural Significance of Xuande Incense Burners with Taiwan's Dated Marks**

Chien-wei Lee \*

### Abstract

There are many ambiguities in dating the Xuande incense burners. There is much ambiguity in dating Xuande incense burners, which are generally judged by their shape and style, especially the writing style of the inscription on the bottom of the incense burners. The inscription “Made in the Xuande Period of the Ming Dynasty” or “Made in the Xuande Period” on the bottom of the incense burners is the basis for dating in the antique market. Through field research, the author found that the Xuande incense burners handed down in Taiwanese temples were mainly donated by believers. In addition to the standardized inscriptions on the bottom of the incense burners, the names of the donors and the year of contribution were recorded on the surface of the incense burners. These inscriptions, featuring donor names and donation dates, offer more concrete chronological evidence than the controversial base marks. This finding not only clarifies the timeline of Xuande

---

\* Distinguished Professor, Master's Program of Culture and Social Innovation, Feng Chia University.

censers' presence in Taiwan but also challenges some established narratives about the antiquity of certain temples.

Keywords : Xuande Incense Burners, Style, Engraved Date, Metal Composition, Myth